

匿名对华战略报告

“经译求经”出品 第三十期

“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罗轻舟。

本期导言：2021 年 1 月 28 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了一份有关美国对华战略建议的匿名报告，该匿名报告系前美国官员匿名所作。鉴于该匿名报告内容较为特殊，特提醒读者诸君请勿在中国境内传阅本期内容。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2021.2.28



经译求经

目 录

中国挑战之重要性	3
美国之回应：政治麻木亦或战略视野	6
研判中国政治的优先事项	17
中国持续进化的美国战略	31
建立长期的美国对华战略	50
总而言之：有效的对华战略都有哪些内容	64
结论	78

更长电报：指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

DeepL 吴译凡 译

吴译凡 不慢 罗轻舟 校

中国挑战之重要性

美国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习近平领导下日益专制的中国之崛起。共产主义中国，由于其军事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现在深刻地影响着美国重大国家利益的每一方面。这涉及到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贸易、投资、资本市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技术的未来、人权、整个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未来。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不断增长的国力，现在对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这样的挑战是苏联从未做到过的。某种程度上，这是过去 20 年逐渐出现的结构性挑战。然而，习近平的崛起凸显了这一挑战，并用后毛泽东时代以来其前任们一直不愿接受的方式加快了这一挑战的时间表。

与过去更相背离之处是，上任 8 年以来，习近平还表示他打算将中国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外交政策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延展到远远超越自己的边界之所在，推向整个世界。换句话说，习近平不再只是中国之邻国和美国的难题。他现在给整个民主世界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难题。简而言之，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同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维持现状之大国。对于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变化。

对美国而言，不管是在共和党亦或民主党执政时期，同样根本的战略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国要制定一个完整的跨党派的国家对华战略和行动计划，为未来 30 年美国应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提供对华政策的内容及实施方面的指导。何以需要这样一个长期之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

1. 中国的崛起代表着战后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上的美国领导权的最重大挑战——这一挑战已经使许多欧洲、亚洲甚至中东盟友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战略对冲。

2. 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亚太地区已经成为 21 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和未解决的安全紧张局势的最大源头——现在正受到中国兴起为军事上的同位竞争者（peer-competitor）和卓越经济大国的重大挑战。

3. 中国的党国体制展现出的对基于规则的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政策和姿态，以及过去特朗普政府常常含糊其辞的回应，越来越让人质疑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等普世价值的持续有效性。

“冷战斗士”可能会对中国的挑战具有非凡性之主张提出质疑，鉴于美国 and 苏联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核对抗之存在。然而，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论点证实了今天中国竞技的更大意义。首先，中国与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现代俄罗斯一样，也拥有一支可靠的、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核力量。它比美国或俄罗斯的核武库小得多，但其规模和先进性足以使中国拥有其领导人一直寻求的二次打击能力，以遏制任何未来的核威胁。其次，与苏联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拥有真正的全球经济能

力、影响力。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认知中，中国处于未来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阶段，尽管双方在贸易、投资、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仍会有不同的优、劣势。第三，莫斯科从来没有有效地挑战过美国战后对亚太或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主导权。中国却有。第四，习近平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对美国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战争，但已经明确表示，它无意被动或主动地接受美国所宣称的作为美国国家和国际精神核心的价值观。相反，中国现在在国内和国外捍卫自己的威权资本主义。第五，尽管美国在五年前就对此有很多怀疑，但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在对抗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方面已经达到了彼此战略共存的程度，这已经颠覆了 1972 年首先定下的战略地图，当时北京和华盛顿联手对抗莫斯科。那个世界早已远去，可能永不复返。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规范其对美政策的综合内部战略。到目前为止，这一战略的实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并非是完全的。虽然美国以遏制的形式实施了对付苏联的统一国家战略，对中国问题上华盛顿当局至今没有这样的战略。美国有一个新宣布的对华战略，被称为“战略竞争”。但是，华盛顿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可操作的战略来使其生效。这是在国家责任方面的失职。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核心目标为何必须是在未来一个世纪内保持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优先地位。这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无论美国自己是否喜欢，美国的领导地位仍然是维持、加强，并在必要时创造性地重塑自由国际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一个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独裁国家不仅会导致当前秩序的消亡，而且在此过程中也会削减美国的利益。最终，将会使美国的灵魂退化，包括对

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怎样之人以及美国在世界之中支持什么的固有理解。放弃这一使命，意味着“山巅之城”将淡出人们的视野，因为美国只是另一个狭隘地追求民族私利的民族国家。

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的基本原则必须继续成为理想的核心。虽然这些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是近来之创新，但它们现在已成为永恒的价值观，并成为世界上任一角落的独裁者之困扰。这些普世价值在国际体系结构和形态上的制度表达，必然会随着未来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由的国际秩序要想真正生存下去，就必须是这些价值观的动态而非静态的体现，因为世界本身在深刻的技术扰动之推动下在我们周围迅速变化。然而，这些基本的自由价值必须仍然是美国战略的真正追求。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没有其他国家准备好或能够成为这些价值观的全球标准持守者。拱手让出这个角色，就意味着将未来的秩序及其基本的观念架构拱手让给不同形式的独裁。

美国之回应：政治麻木亦或战略视野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可以通过致命的政治麻木和战略漂移之组合，悄悄地屈服于目前在它周围展开的挑战性现实，或者它可以选择以一种战略上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以捍卫和促进其核心利益，就像美国实施过的在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替执政下对抗苏联那样。然而，美国新的国家对华战略必须立足于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现在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比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现在受到的制约更大。这些情况要求对华政策反应方面，相较直率的遏制手段，需要性质上不同的更加细化之反应。简单复制“带着中国特色的遏制”，或者以全面与中国脱钩为前提，都不可能有效实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

标。这种做法可能对美国自身的利益极为有害。我们应该记住，凯南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长电报”主要是对苏联模式本身内在结构性弱点的分析，并立足于其分析结论，即苏联最终会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下崩溃。整个遏制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批判性假设之上的。

然而，这需要一个勇敢的分析家对中国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然，在中国的体制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结构性断层——最引人注目的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束缚和极度不受约束的私营部门的市场需要之间的断层。然而，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战略一直是一个持续的，几乎是周期性的，在党和市场的竞争紧张关系之间进行再平衡，周期性地在“左”和“右”之间摇摆，以使国家和经济大体上保持在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的道路上。因此，美国战略家如果认为美国未来有效的对华战略应主要建立在凯南式的推断上，即中国体制必然会从内部崩溃，那将是危险的。中共在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做法要比苏联同行灵巧得多，这得益于中共十多年来对 1989-1991 年关键事件中苏联“出了什么问题”的认真研究。习近平个人痴迷于中国共产党需要从苏联灭亡的例子中吸取教训，他在 2012 年的一次讲话中告诉他的政治局同事，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他们的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而“军队被非政治化，从党中分离出来，并被国家化，（并且）党被解除了武装”。他警告说，尽管“从比例上看，苏共的党员人数比我们多”，苏联覆灭是因为“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¹当然，在内外压力完美结合

¹ 习近平的讲话被记者高瑜引用，由“Seeing Red in China”翻译为英文，并由苏菲海滩发布，《泄露的讲话显示习近平反对改革》，《中国数字时报》，2013 年 1 月 27 日，2020 年 12 月访问。<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3/01/leaked>

的情况下，在一系列尖锐的系统性危机的引发下，中共可能真的会垮台。不过，美国的战略家如果把赌注押在这上面，那就太愚蠢了。仔细分析那些中国政策行为中，美国希望看到改变的部分，并运用任何可用的政策杠杆来帮助实现这些改变，要好得多。这种杠杆如果被明智地应用，也可能有助于中国领导层朝着更亲市场、更少独裁、更少民族主义的方向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可能在长时段导致政体变化。

然而，在这期间，现实的目标，至少在未来关键的十年中，必须是对北京当局实现可衡量的政策变化，迫使北京的政权遵守当前自由国际秩序的原则。这一目标与北京当局目前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即在名义上遵守现有国际体系的规则，而在行动上，只要这些规则被证明是不方便的，北京当局就会无视这些规则。同时，北京当局还忙于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范围，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国际支持，开始从内部悄悄改变国际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因此，对美国而言，明确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以及如何才能使同时影响美国的核心利益和当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中国当局之政策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是为未来艰难的数十年发展有效的国家战略的重要前提。

-speech-shows-xi-jinpings-opposition-to-reform/.（译者注：原报告中缩写版在前全文版在后，注释采尾注，共 21 条尾注。其中尾注 1-4 对应的原文在缩写版内，报告全文版的尾注从 5 开始。因译者已翻译了报告全文，不再翻译缩写版报告内容，仅译出尾注 1-4 注释部分内容附在文末。为便于阅读，译者将全文版的尾注改为脚注并从 1 开始编号。）

政治声明并非战略

本报告的目的是概述这种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要详尽说明最终的、细化形式之战略，这是全方面制定和操作性的战略才会采用的。而这应该属于专注而保密的跨机构流程下的专属工作，其后是与美国最密切和最重要的盟友进行密切的政策合作。在制定这样一项详细的战略时，新政府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系统办法。必须从头开始审视中美关系的每一个政策领域，以这样一种基准来衡量每一个领域：哪些单独的政策措施将产生最大的影响力，使中国的战略决策和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

这种做法，与美国目前不是聚焦于可操作的战略内容，而是对新战略应该叫什么名字的政治和知识执念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在创造下一个理论上的尖锐词句方面付出了太多的努力，这个词句被认为将被历史视为是近四分之三世纪前凯南关于遏制问题杰作的可敬之知识继承。这种迷恋混淆了形式与实质。它还混淆了宣称的理论与完全可操作的战略，这也是许多标榜为美国大战略的计划所存在的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突如其来的宣示往往会因为简单地透露太多信息而破坏可操作化战略所要达到的目的。中国作为战略不透明方面的大师，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无畏而公开的正式声明也有可能让中共的宣传机器有机会大展拳脚，在被中共不断俘虏的中国国内政治受众那里，诋毁美国最新的背信弃义计划。

相比之下，北京中共政治局的硬汉们总是看美国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因为这就是中国自己对待世界的方式。一个有效的中国战略中枯燥的工作在于其详细的政策内容：仔细分析美国的哪些政策

能够实质性地制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中国的特定行为；然后是更艰巨的长期协调执行的任务。诗意可以晚一点，如果会有的话，一旦处理了枯燥的政策和行政公文事务，诗意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报告干脆用《长电报：迈向美国新的中国战略》这个例行标题。这种战略的名称，亦即其宣告之形式，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美国新政府要尽快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可操作的战略。

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尽管美国面临的挑战很严重，但目前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战略。华盛顿充其量只有对华之姿态，但它仍然没有战略，更不用说可操作的战略了。大战略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美国人对中美双边关系下积压的大量沮丧情绪提供一个知识、意识形态或情感上的发泄口；不是为了让美国人觉得把“中国的事情”直抒胸臆摊开了，因为美国人对北京都“义愤填膺”；甚至不是为了有一个最好的俏皮话，帮助一个候选人在辩论中战胜另一个候选人。这样的目标对一两个政治选举期可能会起作用，但是是在现实状况最终追赶上来，并且全球力量平衡甚至会更快地继续滑落下去之后。相反，今天要做的负责任的事情是制定一条实质性的前进道路。

有些人可能会指出，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 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证明美国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国家对华战略²，然而，即使是那些支持《国家安全战略》的人也很难证明，仅凭这份文件，或者是紧贴着这份文件的其他文件，就能被等同于当下指导美国对华政策方方面面的详细的、可操作的战

² The NSS can be found at: <https://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7/>.

略，更不用说能够得到国内政坛两党和国外主要盟友的认可和拥护的战略了。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几乎从上任第一天起，内部对中国战略的分歧就很明显。在任何一天，哪一派会在这场辩论中占上风都是不确定的：那些只关注贸易的人；那些希望看到与中国在经济上更广泛地脱钩的人；那些寻求全面地削减中国权力的人；以及那些寻求完全推翻中共的人。这份人员名单撇开了一位总统，他继续与独裁者（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眉来眼去，只要在他能与他们互动的地方，他可能认为这是确保美国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的持久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一个连贯、全面、可操作的战略来应对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而不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往往无法理解的推文。若不如此行事，会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嘲讽的对象，被一点一点地侵蚀美国辛苦挣来的政治资本。与此同时，专制主义的竞争者为了追求自己精心界定的国家利益，执行着严肃而系统的治国方略，如果美国方面没有一个分析方法驱动而持续的反制战略，那么这些策略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美国战略中缺失的一环：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薄弱环节

由于无力理解中国国际关系政策行为的基本国内政治驱动力，美国在制定有效的中国战略方面的努力接连失败显得特别突出。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当局经常倾向于将美国自己对北京当局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或应该如何行事的各种假设投射到中国身上——这是一种战略镜像作用，即根据你自己的政府会如何行事来分析中国当局会怎么做。

³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当局对北京当局的实际想法、为什么这么想，以及美方的行动可能会改变北京当局的想法，再次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作为替代，美国的主要兴趣往往是某项声明在美国国内政治机构中会被如何倾听，而不是该声明在改变北京的政治心态和相关政策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凯南 1946 年对苏联的分析之核心智慧是他对苏联内部如何运作的评价，以及沿着这一复杂的政治现实的纹理运作制定美国战略的洞察力。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同样需要这样做。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案例联系起来的是，中共和之前的苏共一样，是一个坦率认同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列宁主义政党。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一点常常被遗忘，因为世界已经习惯于邓、江、胡在改革、现代化方面，尤其是是在强健中国经济和国家的努力方面，提供的一种“列宁主义弱化版”（或至少是共产主义弱化版）。虽然 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事件应该让我们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但现在习近平的崛起让中国回到了一种更古老的马列主义正统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不同于邓，也不同于毛。习近平试图跨越这两个传统。他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是毛的变体，在经济上又是邓的变体：不像毛那样“左”，但绝不像邓那样“右”。习近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视为毛泽东的简单转世。他有着比这更复杂的人格，特别是考虑到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在不同时期受到毛泽东和邓的恶劣对待。而且，在习近平最

³ Richards J. Heuer Jr 将情报工作中的镜像定义为“通过假设对方可能以某种方式行事来填补分析人员自身知识的空白，因为[美国]在类似情况下也会这样做”。

See Heuer Jr.,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McLean, Virgi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chapter six, accessed November 24, 2020.

深层的心理当中，他希望在中国政治神坛上超越毛、邓两人。习近平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⁴

习近平一直试图将中国政治大幅向左倾斜：即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政治纪律和党中央的控制。在经济方面，他试图采取中左立场，对中国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的资本主义过度行为进行约束，重振国有企业部门的光景，并提醒中国的富人和名人们最终也要受到党的纪律约束。相较其前任，习近平表现出更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利用种族的民族主义来生成民众支持，并进一步巩固他的领导地位，以对抗越来越多的党内批评者——尽管这也产生了使中国的国际姿态明显比以前更强硬的效果。然而，在中国国内政治中，最有争议的变化是习近平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利用和滥用反腐运动来消灭政治对手，他不承认毛泽东之后的党的集体领导惯例，以及他决定修改党化之宪法，允许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而超过两届。再加上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毛泽东的新兴人格崇拜，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很大一部分精英中滋生出了沸腾的怨恨。

然而，在精英政治之外，习近平的关键弱点仍然是经济。具体而言，问题在于他能否维持党与中国人民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生活水平方面长期以来的非官方社会契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党和人民之间的默契是，只要党能继续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就会（尽管是勉强地）同意党继续拒绝接受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然而，如果经济增长

⁴ 关于习近平的个人历史和心理的较好介绍材料，see Evan Osnos, “Born Red: How Xi Jinping, An Unremarkable Provincial Administrator, Became China’s Most Authoritarian Leader Since Mao,” *New Yorker*, April 6, 2015,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4/06/born-red>.

停滞不前，例如由于政策环境恶劣、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或流行病引起的经济衰退之类因素的混合作用，那么这种社会契约的脆弱结构很快就会开始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而通过情报和安全机构，来维持掌权地位。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监控，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新技术，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身体强制手段来维持政治控制，人们的个人生活中先前受到容许的私人空间的系统性缩减已经开始引起广泛抵触。是的，恐惧是存在的。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现政权的怨恨也开始出现，特别是在中国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中。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些不同来源的民众和精英的不满情绪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凝聚到必要的程度，以阻止习近平在 2022 年中共二十大后继续执政。同样不清楚的是，习近平被替换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回到更加温和的邓小平路线之过去，还是陷入更加激进的民族主义之未来。本文所概述的论点偏向于，如果领导层发生变化，更有可能向更温和的集体领导方向发展。因为迄今为止对习近平的内部批判负荷于，他在国内太左，在国外太强硬。这种新兴的国内批判，在这两方面都不是由外国的观感所驱动的。相反，它是由一种尚未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而形成的，这种观点有三个核心论点：习近平削弱了中国私营部门的信心，而腐蚀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他过快过早发动对外攻势而积累了太多的国际对手，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最特别的是，他激怒美国的做法在时机和强度方面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益的，而且对政权的未来有潜在的危险。在这一点上，美

国的战略家应该意识到，在北京方面，仍然有人对美国的力量存有重大而持久之顾及，特别是在中国旧派的战略实用主义者当中。

围绕习近平个人的内部政治敏感性之外，共产党本身也有更广泛的体制利益，即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执政。党决心要生存下去。如前所述，中共认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并试图将一些经验教训运用到自己的战略中，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共仍然对自己的长期政治合法性的主张感到非常焦虑，虽然中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并通过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形象和宣传机会，如北京奥运会、中国的太空计划和举办重大国际峰会等，努力培养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共意识到，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或商业精英，对中共的历史和诚信，以及中共与人们最基本的利益和愿望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抱有很大的怀疑。他们看到特权阶层疏远于众，自私自利。这种怀疑在年轻人中尤为严重，得以接近互联网和国际旅行使他们质疑，为什么他们不能享受与亚洲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儒家文化如韩国、日本，特别是台湾相同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这些地区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宗教也填补了亿万普通中国家庭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空洞神话和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灵魂时的精神空洞。

许多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历来是正面的，尽管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看法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要知道，长期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学习，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希望来美国生活，因为这个国家继续提供自由。各种形式的自由在中国仍然具有真正的政治潜力，是对中共的绝对权力主张进行切割和持续攻击的基础。自由继续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

级中产生巨大的共鸣。这种效力就是为什么中共在自己的国内媒体上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诋毁西方民主，特别是美国在有效处理新冠危机中的失败。在中共试图巩固自己残缺不全的政治合法性时，一个不正常的美国对于中共在国内的叙事来说是来自天堂之甘露。总而言之，中共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在多方面依然真实存在。

了解这些内部政治动态的颗粒度，将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能够确定最佳的杠杆点，使中国的个别政策行为发生真正的变化。相比之下，忽视这些复杂性，而将中国视为某种单色的政治整体，更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使中国领导层能够在回应美国对中国整体的一般性言论攻势时，调用民族主义严阵以待。推而广之，这些言论很容易被重新解释为对中国人民、文明和民族的攻击。中共是长期打所谓种族牌和民族主义牌的高手，以转移国际上对中国官方政策的任何批评。例如，特朗普政府对 2018-2020 年贸易战的政治管理不善，使习近平能够转移内部越来越多的关于他对中国私营部门管理不善的批评，而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反而归咎于美国的敌意，而不是他自己的经济政策缺陷。同样，当新冠首次在武汉爆发时，美国未能对中国人民表达出团结支持——当时的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反而在 2020 年 1 月底公开对中国的不幸表示幸灾乐祸，称这将“有助于加速就业岗位回归北美”——这再次使中共政权得以重新巩固其在中国人民中的地位，而当时中国人民对中共应对危机的管理不善感到愤怒。⁵实际上，特朗普又给了中国政权一张免罪牌。

⁵ Jackie Northam, “For U.S. and China, Coronavirus Adds Pressure to Relationship Already Under Strain,” NPR, February 14, 2020, <https://www.npr.org/sections/goatsandsoda/2020/02/14/806096040/for-u-s-and-china-coronavirus-adds-pressure-to-relationship-already-under-strain>.

相比之下，中国早就知道了华盛顿当局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区别。中共已经制定了单独的、往往是复杂的策略来应对美国不同的选区，分别针对美国公司、州政府和国会，以及个别选区、大学、智库和文化机构。然而，中国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战略目标都是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在美国各地的影响力，而不是假设国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宾夕法尼亚大道 1600 号。美国需要学习北京的制度自制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也要这样做。

研判中国政治的优先事项

因此，要紧的是要了解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中国是在如此之格局中，设定国际关系决策的框架，而在其中，习近平和共产党有政治上的脆弱点位。对习近平政权的总体优先事项——或者说中共在政治上相当于心理学家马斯洛称之为需求层次的方面——的可操作性理解，应该为任何寻求影响中国未来行为发展的美国战略提供参考。

以下是习近平的十大优先事项，按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列，它们源自公开言论、内部讲话和直接的战略逻辑，而非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官方声明。这十项，每一项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 2012 年习近平被任命为领导层之前。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每一项都有了新的紧迫性，投入了更大的财力资源，在许多情况下，还有了更积极的时间表。⁶

1. 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包括利用领导层可以利用的一切民族主义、经济和意识形态工具，与党、国家、军队、情报和安全

⁶ 本节的内容主要基于陆克文的作品，包括他在美国西点军校对学员的讲话，New York, on March 5, 2018,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understanding-chinas-rise-under-xi-jinping>.

机构的全部强制力一道，建立长期的政治合法性，以维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永久地位。

2. 维护和保障祖国统一，包括西藏、新疆、香港和台湾的政治从属地位，以及最终加强其在南海、东海和与印度共同边界的领土要求。

3. 到 2035 年前保持平均经济增长率在 5%左右或以上（尽管有新冠危机）。届时，习近平的目标是实现他的承诺，使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将人均 GDP 提高到 2 万至 3 万美元之间）；使中国经济规模增加一倍或两倍；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做到这些的同时，他必须恢复和保持充分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社会稳定。这种增长还将为中国继续扩大军事和技术能力提供经济基础，并使中国遍布全球经济的印迹成为设定全球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标准之根据。

4. 在经济目标与新的国家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之间取得平衡，这被认为是应对公众日益对空气污染、水质、土壤污染、食品质量标准、缺水 and 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关注所必需要做的。

5. 扩大、改革和现代化中国军队，使其成为一支能够进行复杂的联合行动、能够在亚太地区打赢战争的世界级力量，必要时以武力确保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的领土要求；同时将反介入/区域阻绝战略延伸到第一岛链，并最终延伸到第二岛链；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决定未来战局结果的一系列军事技术方面超越美国。

6. 将中国的邻国转变为温和并最终顺从的战略伙伴，通过在中国的 14 个邻国和 8 个有争议的海洋边界布局政治影响力、经济牵引

力、外交政策观念和不断增长的中国军事能力（加上美国在这些地区后撤的长期前景）。

7. 保卫中国东边的海洋外围，直至第二岛链，最终使美国与联盟的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甚至可能与澳大利亚脱钩，同时也破坏美国与其他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准军事合作关系。

8. 确保中国在西部更广泛的大陆周边地区的安全，通过确保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一致和支持，部署一带一路计划（辅以其他双边和准区域经济和安全安排），以扩大中国在中亚、南亚、中东、东欧和西欧的战略影响力和经济技术足迹。

9. 扩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影响力，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在内。这两个地区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的来源，也是整个联合国体制的多边支持之重要来源，有能力促进联合国未来的人事任命和体制变革。

10. 逐步将全球秩序转变为更符合中国利益和价值观之形式，使其更加多极化，更少以美国为中心；加强中国在现有多边体系内的存在和影响力；在现有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建立新的机构；将习近平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支撑上述一切的概念载体。⁷

⁷ 虽然习近平现在经常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the term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or alternativel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的说法，但该词的定义迄今一直被刻意模糊。有可能是中国领导人自己还没有确定它的含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概念性的词语引入并散播到其国际论述中去，然后再充实出一个其认为最有用的确切含义。这是中共话语中的常见做法。

如果这是对习近平核心利益的准确描述，那么判断其中哪些是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哪些是潜在的重叠的，哪些是现在发生了根本性冲突的，则是另一回事。从表面上看，习近平版的中共的这些核心利益现在大部分都会落入“相互矛盾”之范畴（fall in the “conflict” category）。不过，正是这种分析的严谨性，应该成为美国对每一种利益的政策回应的基础。

认识中国的战略优势

中国确保国家优先事项的能力将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弱点，其国家战略的有效性，以及针对中国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力。近年来，北京的情绪近乎于一种非理性的自信，认为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华盛顿，这种情绪有时也反映出一种同样非理性的悲观主义，认为美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两国首都的这种情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因为它们没有反映出每个国家客观的战略能力和政治倾向的现实。除了对中美两国的相对能力进行正式的净评估之外，即使是对中国目前的优势和劣势进行简单的概述，也会显示出比两国首都的政治精英们通常所假设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中共领导层认为，相对于美国及其伙伴、盟友，中国在主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和文化领域有许多优势。

1. 一个明确的实现国家目标的国家战略， 以及一个能够在没有明显内部分歧的情况下调动资源使该战略生效的政治制度，与美国、整个西方国家和印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认为这些国家在结构上被繁琐的民主、联邦和其他审议程序所束缚。

2. 预计和应对未来挑战和机遇的制度化能力，使中共能够调整其战略或战术方向。

3. 监控式国家的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增强了中共长期保持绝对控制的能力。

4. 迄今通过经济政策重新巩固中共的合法性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一个标志，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和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初)爆发后算起来。

5. 国内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依然持续存在，鉴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的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即使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困难，国内需求也有很大的潜力来推动未来的增长。此外，中国的电子商务革命还有尚未开发的潜力，中国政府也希望将其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新近经济伙伴那里。

6. 过去20年积累的现代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全国性的高速宽带、全国性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以及弥补历史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能源供需缺口之相关设施。

7. 涌现出的重要的国内创新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其中包括高新技术和人工智能部门，这些部门不再主要依赖外国资源，并得到了充足资金和日益成熟的国家科研机构的支持。

8. 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没有任何重大的美元债务，加上对中国资本账户和不可自由兑换之本币的持续控制，凸显了中国抵御外部引起或诱发金融危机的能力。

9. 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取得了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区域军事均势，这一点从中国扩大的常规火箭军、

海军和空军，以及包括了在印度洋、中东和更广泛的世界扩大“远海”部署的能力的不断增强之力量投射能力中可见一斑。

10. 中国迅速获得了用于攻击和防卫的网络战能力，包括民用和军用的品种，使中国在这一重要领域至少与美国平分秋色。

11. 空间系统的建立，包括独立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的全球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在任何重大冲突中可针对美国重要空间资产部署的进攻性反卫星能力。

12. 中国核三角系统的稳步现代化和坚固化，由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提供了对美国进行二次打击的可靠能力。

13. 认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的政治意愿下降之信念，此信念基于美国人可能要付出的牺牲代价，以及甚至即使美国仍然存在进行干预的政治意愿下，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的军事能力下降，因为美国传统的力量投射资源在未来的任何制空和制海战争中都容易受到中国陆基导弹的攻击。

14. 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战略的成功，可以从美国没有进行重大军事反击中看出。此外，北京还恢复了与其他在南海有领土要求之国家的外交解决进程，减少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总体军事紧张关系。

15. 朝鲜作为紧急的国家安全顾虑的地位在下降，这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决定减少对平壤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将之作为 2018 年启动的美国持久的外交进程的一部分之后。

16. 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和深化，消除了来自中国近邻的长期重大战略威胁，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防、技术、能源和金融合作，从而增强了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影响力。

17. 中国在整个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印迹，使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就外国直接投资或总的资本流动而言还不是这样)。

18. 中国在韩国和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的巩固，特别是在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是以损害美国的相应影响力代价。

19. 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鉴于欧洲的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以及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政策相对不感兴趣，北京认为欧洲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国”，这是中国与美国就全球秩序的未来进行战略竞争的一部分。

20. 美国缺乏任何重大的外交、经济或对外援助反制战略，指向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成功，中方此道畅通。

21. 中国在多边和全球治理机构中的外交影响力得到巩固，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以一带一路计划为基础的平行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区域组织之间的“N 加 1”接触网络（均以北京为中心），则加强了这种外交影响力。

22. 对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国际观感——由中国迄今取得的总体国民经济成就所产生——造成一种日益增长的既成事实感，即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未来十年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这种

感觉被一种牢固坚持之观点所强化，虽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被普遍认同的。据此观点，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过度扩张、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流行病以及国家内部不可调和的政治和社会分裂，美国已经受到了致命损伤。

23. 一种关于中国的文明、文化和国家韧性的深远意识，认为其能够应对美国的任何挑战，与其认知到的美国之脆弱形成鲜明对比。

24. 党-国最高层内部所持之观点认为历史是站在中国一边，进步的衣钵从美国和西方传到中国和东方，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揭示的。

25. 中共党内的一种信念视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尾声，证据是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的抬头，这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方案核心之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全世界升起了“良性专制”政府形式之新时代。

理解中国的战略弱点

中国的战略弱点和它的强项一样重要，尽管中国领导层相比外人更不愿意承认其中的一些弱点。对中国弱点的清醒反思应使美国的战略家们不至于过早得出中国已成为某种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的结论。尽管中国有坚定的国家战略和现任领导人的绝对决心，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轨迹仍有许多可能出错的地方。中国的弱点很多：

1. 不稳定性内在于中共的高层领导交接程序。自毛泽东以来，中共六次重大领导层更迭中，有四次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尽管这些清洗没有发生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因此，与党内矛盾相关的易碎性仍然是中国当局的主要政治关注点，包括习近平当局。最直接

的关切是 2022 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的紧张关系，届时将就延长习近平的统治期限超过正常的两届任期作出决定，这实际上将使习近平成为终身领导人。⁸这加剧了一部分不完全认同习近平项目的人的个人和政治脆弱感。

2. 中国由来已久的“昏君”问题，如果全权的领导人不了解重大的内部或外部威胁的性质，系统不容易自我纠正。这仍然是中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弱点。以习近平为例，他已经成为“一切小组的组长”（chairman of everything），现在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昏君现象创造了一种担惊受怕的谄媚的政治和官僚文化。这使帝王与客观信息和建议相隔绝。

3. 对马列主义的实质信仰仍然存在问题，在中国人那里，包括共产党员。他们从未从反右运动（1957-1959 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自我伤害中恢复过来。再加上党内精英们几代人的特权和腐败，以及国内受教育阶级的国际经验和互联网接入，导致对体制的信仰危机加剧。

4. 最近对党的合法性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于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层，他们的成员感觉到习近平领导下新的政治和政策限制，越来越扼杀了他们在国内外建立大型、盈利的私营企业的努力。

5. 新兴的对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主张的宗教挑战，来自于精神信仰兴趣的爆发，特别是佛教的复苏和基督教新教的指数式增长，二者

⁸ 2018 年，中共取消了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并打破了强制退休年龄的规范。2022 年的问题是，中共事实上是否会投票授予他第三个任期。

都破坏了一个单一的、无神论的政党的基本价值观及其对绝对政治和个人忠诚的要求。

6. 达赖喇嘛在当地和国际上持续的受欢迎程度，削弱了中国对西藏领土统一的要求。

7. 削弱当局的分裂运动在新疆，愈演愈烈，由于中国对当地维吾尔族民众的镇压。

8. 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立法和政治镇压是有代价的，即使民主抗议运动在中国国内被解释为对党的长期合法性的进一步挑战。北京的高压干预对中国的全球地位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包括促使西方国家进行金融制裁。

9. 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长期困境，现在被归纳为二者之一：要么加强中共对经济的控制，这将导致私营部门的信心、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下降；要么加大市场自由化，包括减少中共、国家计划和国有企业的作用，这将导致更可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但也将导致党在中国国民生活中有被边缘化的政治风险。

10. 生产力增速静止或下降、人口快速老龄化、国家劳动力萎缩，这三个核心因素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是习近平的前任们不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政治问题，新冠病毒危机对平均收入、就业和小企业的经济影响更是雪上加霜。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因冠状病毒而失业或减薪，而且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特别大，这一流行

病可能只会加剧已经迅速成为地球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的不平等
问题。⁹

12.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持续扩大（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目前占 GDP 的 310%），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影子银行部门提供资金。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如果允许企业违约倒闭，可能会影响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¹⁰

13.中国公共财政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由于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央政府没有能力管理未来对医疗、养老和退休福利的预算需求，而省级和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税收基础来支持当地社区的需求，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14.中国的大学质量不高，加上中共对学术自由的控制不断加强，导致人才不断向西方流失，对创新活力和人才的有效培养和留用，产生了负面影响。

15.全面经济脱钩的威胁，制约了经济增长。在贸易、投资、技术和资本市场等方面与美国以及可能与欧洲和其他美国盟友脱钩，可能会给中国的长期增长带来进一步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中国的国内需求无法完全弥补外部需求的萎缩，以及中国国家技术战略前景的实际不确定性。该战略目前要求中国未来技术需求的国内采购，特别是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实现自力更生。

⁹ Sonali Jain-Chandra, “Chart of the Week: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log, September 20, 2018, <https://blogs.imf.org/2018/09/20/chart-of-the-week-inequality-in-china/>; “China—Rapid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policy brief, July 2020, https://www.ilo.org/emppolicy/areas/covid/WCMS_752056/lang--en/index.htm.

¹⁰ “China’s Debt Problem Is Really an Asset Problem,”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17943d46-62fa-11ea-b3f3-fe4680ea68b5>.

16.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处于弱势，国际金融体系仍然由美元主导。尽管中国不断努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避免在对外贸易中做美元中介，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以支撑其在国际电子商务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并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一现实弱势依然存在。中国的这些措施远远止步于货币的全面自由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有关将政治对经济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衰变化方面，中共仍然保持着重要忧虑，这牺牲了中国发展可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全球金融中心的能力。

17.中国面临着污染方面越来越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代价，包括空气和水污染、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在中国的粮仓——华北平原，情况尤其如此。由于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环境污染问题还影响到中国主要河流系统的未来，以及中国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结果是更严重的北方旱情，以及前所未有的南方洪涝灾害。

18.中国的能源依赖存在长期脆弱性，对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一旦国际能源供应出现重大地缘政治干扰。

19.中国军队缺乏战场经验，在过去 70 年中，这与美国的丰富经验形成鲜明对比（**The absence of any battlefield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over the last seventy years contra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xtensive experience.**）。中国海军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传统可供借鉴，尽管在未来与美国的任何冲突中，海洋领域都是核心。

20.现在很可能做不到与台湾达成任何政治解决方案，不管是在民进党或国民党在台北执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大陆对台的各种努力将集中在风险大得多的军事或其他胁迫性选择上，包括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

21.一带一路计划的财政和外交政策成本正在增加。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为满足中国在他国引发的期望，哪怕只是一部分期望，所需的投资规模巨大；由于缺乏市场效率，甚至没有必要，这些投资缺乏可持续的财政回报；由于中国建设的项目环境标准低下、财政透明度不足，以及受援国承担过多的偿债义务，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逐渐增长。

22.侵犯人权事件下中国的国际形象所受到的名誉损害正在不断增加，发生在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逮捕中国大陆汉族异见人士、律师和基督教活动家。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中国新出现的监控国家之规模以及其能力远远超出中国国界，这更加剧了这种损害。

23.种族主义之下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声誉问题正在出现，因为在中国境内普遍存在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而且中国企业与非洲当地员工之间的种族关系紧张，导致最能获得物质利益的非洲精英与更广泛的非洲公众之间，对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产生了意见分歧。

24.中国的“战狼”外交越来越脆弱，国内政治命令式的取悦党的领导人物，需要通过积极向惹人讨厌的他国“传递信号”，结果越来越适得其反，使国际舆论对中国不利。

25.中国软实力有限的长期问题依然存在，流行音乐、电影以及其他娱乐和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专制政治的制约。这继续阻碍着中国更广泛的国际地位的发展，不仅在西方国家那里，也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里。

这份名单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精英们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这种焦虑的核心在于中共对自己在中国人民眼中的政治合法性之担忧，以及无力在缺乏高压控制的情形下继续执政之担忧。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广为认同的。然而，解除党的意识形态束缚，或者允许对党的政策失误进行任何批判（包括在新冠问题上），鉴于1991年苏联的命运，而被习近平判断为太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决心坚定不移地以意识形态为由捍卫党的合法性，加倍鼓吹马列主义，并加强使西方自由民主非法化的运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试图通过更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形式，为党建立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新的合法性支柱，把党塑造成对抗美国、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真正捍卫者。因此，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政党，处于中国国家、经济和军事这个强大机器的中心，但它也是一个格外担忧之政党，对它的集体未来感到恐惧——以及由它滋养的个人政治生涯和个人财富。

这种对中国政治潜在脆弱性的判断，包括党内对其长期合法性的持续担忧，应该是未来所有对中国的美国战略审议的核心。简而言之，中国的战略优势不比它的许多弱点大，两者都与任何关于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深思熟虑之分析相关。

中国持续进化的美国战略

中国实施的对美战略在其官方体系内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名称。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描述其最新对华方针时使用大量不同名称：从战略接触，到竞争，到脱钩，再到遏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诸多表述。而在北京，它被简单称为中国的“美国战略”。这一战略是中国官方更广泛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综合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中国现在所处的整体战略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的重头戏，正被纳入上述世界观之中。通过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央军委以及习近平于 2014 年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协调，经过规范的分析程序，这一世界观得到了完善。而习近平同时位于这三个机构的核心位置。

中国的战略，以自己的古典传统为依据，从根本上说是现实主义的。它的基础是权力平衡学说，而中国提出这种学说比普鲁士将军、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早了两千年。它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追求打胜仗的传统，即，直到己方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才会接受与敌方作战的风险。欺骗的战术也在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这些悠久的国术传统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具现代性的苏联“力量的相互关系”概念，其目的是要汇总国家权力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技术、能源、自然资源、人口和

军事等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中国自主发明的一个概念：综合国力。中共大约从 2000 年开始计算中国和其他大国的综合国力，其内容包括编制了一张中国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之间国家实力的比较表。大约十年前，这些内容都停止发布。随着中国比较地位的迅速上升，这些半官方的权力评级导致该党担心，如果继续发布这些内容，可能会引起邻国的警觉，并破坏中国长期宣传的“和平崛起”的政治口号的可信度。

长期以来，中国对美战略的根本决定因素，一直是北京滚动计算的中美双方军事、经济、科技实力的平衡。邓小平的革命的基础是，在实现经济现代化之前，中国永远不会在任何领域与美国竞争——所以在习近平掌权前的 30 年里，中国所有其他的政策目标都是从属于（现代化）这个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在这期间，当中国认为其在力量平衡方面继续处于不利地位时，其领导层普遍倾向于静悄悄的外交，反对在解决各种国际问题方面与他国公开对抗。然而，随着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在各种衡量国力的比较中开始形成更大的平衡，中国感到在其所有国际关系中，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来行使更多的强硬，甚至是侵略性的措施。

起初，这些措施主要用于对付挪威、瑞典、新加坡、菲律宾这些较小的国家。然后升级为对付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最近，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开始在美国身上试验这类做法。其原则是相同的：北京只会在认定其在与某国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且该国的报复对北京的利益只会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害时，才会使用强硬外交手段。中国的一句成语“杀一儆百”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固有的策略和政治

文化。如今它被用于收拾那些不太顺从的国家。其主要方法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对那些冒犯中国的国家施以惩罚。如果中国断定在中国对美国的友邦和盟国施压时，美国不会介入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种做法就会被更多地采用；更糟的情况是，如果中国的领导层发现，中国惩罚了其他国家的后果是美国乐于借机从美中贸易关系中获得商业上的利益。

北京目前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在 2002 年左右确定的。当时，中共的领导层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911 恐怖袭击后，“反恐战争”将分散美国领导人对中国崛起的注意力，为中国赢得了一段较长的发展阶段。911 让中国的战略家们松了一口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加速了布什政府对优先关注事项的调整，2000 年总统竞选时其提出的对北京实施新的强硬政策的计划被束之高阁。这种转变使中国能够在全球反恐运动中安静地与美国合作，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从华盛顿的战略火线上移开。然后在布什政府支持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尽管事实上这一谈判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经进行了。而共和党之前曾称这一举动是对中共的姑息。

加入世贸组织很快就成了中国最关键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快速增长以及财富增加。它使中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制造国。中国领导层的结论是这一“战略机遇期”将持续到 2020 年左右。在中国看来，这股发展洪流是由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并且，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将进一步支撑中国的长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战略机遇还

得益于以下因素：美国的战略、经济和预算实力相对减弱，2008 年的大衰退，中东的泥潭不断加深，以及美国战略过度扩张引发国内孤立主义的缓慢出现。北京还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本身将不会受到任何重大地区性武装冲突的牵连，否则北京将被迫把注意力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上转移开。综上所述，中方认为，这些因素将产生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国的相对实力将得到增强，美国的实力将被削弱，而中国将得到更大的自由以公开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

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战略的核心组织原则是（邓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这旨在稳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实力，并逐步把中美之间的实力相对关系转变为对中国更有利，但却不会引起华盛顿对中国过早的、对中国不利的关注，以防美国政治领导人改变那些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国更直接的战略目标主要局限于针对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准备。这一目标源于中国为避免重蹈 1996 年台海危机覆辙的需要。当时，部署于中国海岸线边缘的美国航母让中国在政治上受到了羞辱，并且北京发现它没有有效的军事手段来应对这一状况。作为中国每一代领导人的首要目标，尽早统一台湾的强烈政治愿望同样也是其动力的一部分。然而，除台湾之外，在这一“战略机遇期”，领导层的总体战略主要集中在建设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增强中国能采取的综合举措，从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使其指向北京仍旧模糊不清的国家终极目的。

习近平如何改变中国的美国战略？

这一战略持续了十年，直到 2012 年习近平以至高无上的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虽然在中国官方思想中“战略机遇期”在 2019 年之前仍然存在（包括将继续适合中国的崛起的相对良性的外部环境是其关键的基本假设），2013 年之后，习近平已着手在一些关键方面改变中国的战略政策方向。首先，他正式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谨慎渐进主义策略，而习近平的前任们在此前三十年都遵循这一策略。习近平却颁布了新的、充满自信的的国际政策，以更积极的姿态声张中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习近平开始对一系列“国家根本利益”进行宽泛的定义。而他的前任对这些问题要么沉默，要么含糊其辞，要么不清不楚。这些问题的包括：南海填海造岛；一带一路；以及作为推动中国创新、科技和人工智能发展计划的“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展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军事力量扩张、现代化及重组，以确保多兵种的解放军部队在联合行动中“打胜仗”；与俄罗斯关系的明显战略调整；推出中国外交新举措，在全球范围内就与中国国家利益不一定有任何直接关系的问题发挥主导作用；为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秩序编制的新的概念框架。习近平还加快了一系列既定的国家政策任务的完成时间表。“两个一百年”目标——2021 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049 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仍将是中国借以实现中等收入水平 and 经济先进水平的主要目标。不过，习近平在它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中间环节——2035 年的目标。如果 2022 年他成功连任，这个目标很可能在习近平自己的任期内完成。用习近平的话来说，那

时中国将会“凭借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领导者”，并成为“国际社会上令人引以为豪的积极成员”。

最后，预见到国际社会对其更强硬的态度可能会有反应，习近平还力图降低中国的国际经济的脆弱性，以应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迅速恶化。他旨在将国内消费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传统的依赖国际贸易。他已经开始将中国的国家和国际能源供应多元化，包括与俄罗斯签订新的长期合同。本土技术创新已被列为优先事项，以防止中国在半导体等关键零部件上继续依赖外国供应。此外，习近平还力求尽可能地减少国际经济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以解决未来美国实施金融制裁时北京的脆弱性。

习近平领导下的另一个战略变化是，习近平有了新的意愿冒更大的政治风险，以追求某些战略成果。令习近平确实吃惊（至少是直到不久前）的是，面对中国诸如开发南海岛礁之类日益露骨的利益扩张，美国竟然没有实施任何实质性的反制措施，这一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虽然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们一样，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任何过早的军事冲突，因为这样中国可能会输掉战争，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及整个政权的合法性，但为了加快实现一系列外交政策目标的步伐，他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中国中央领导层传统的共识性的做法。同样，如上所述，这种意愿让习近平在政治上面临着国内的指责，这种观点认为这些过火举动可能导致失败，尤其是在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远未能支持中国主导中美关系时，这些举动可能招致美国的负面的战略反应。

美国对习近平新政策方向的强烈反应，导致中国官方系统正式检查中国延续了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依然存在——如果无效，那对于中国大战略的整体方向又意味着什么。这源于美国贸易战和“科技战”日益增长的影响，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更广泛的经济脱钩的预期，以及在疫情发生后，美国可能针对北京采取更广泛的战略政策攻势。中国已经认定，美国对北京的基本态度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而且这一改变体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共同意志。他们已经细致地注意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关于批评中国的法案的投票。他们已经看到同样的情绪出现在一系列的两院委员会议程，以及更广泛的政治报告中。早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上公开宣布的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时代可能现在要宣告终结了。然而，美国分析家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当初中国的战略家们所预言的，这个利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分心而迎来的机遇的时代将持续二十年。事实证明，中国的战略家们是对的。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北京正在进行的战略评估将产生什么结果，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整体战略将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中国是否会从以前的强硬政策立场上退缩，甚至是策略性地屈服于美国在某些领域的施压？还是习近平会打出民族主义牌与美国全面翻脸？国内经济改革会不会出现重新调整，以实现中共在 2013 年擘画的经济改革蓝图？是否会伴随着对日本、欧洲、印度和东南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更大规模的经济对外开放，以抵御美国即将采取的行动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是会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出现一个更强烈的左转，而在国际上摆出更强烈的重商主义、民族主义、侵略性的中国姿态？或许会出现上述情况的杂乱的结合。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处于不确定的政

策地带，因为在确定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调整实际程度之前，中国的对美政策重估程序就不会下一个定论。

然而，基于以下两点现实的假设，即，（一）拜登政府不会否定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战略原则的基本原理；（二）习近平的战略目标是将基本保持不变，我们有理由认为，习近平未来十年的美国战略将大体上保持不变。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必要时为了降低中美关系的整体政治温度而采取策略性调整的空间永远存在。在北京领导权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的战略是建立在现实性的认识之上的，即美国对华整体态度的强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党的共同意志，这很可能是持久的。而在拜登政府任内，实现中美关系“重置”的机会是有限的。例如，据报道，在 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否决了一份与特朗普政府制定的贸易协定草案的初稿时，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现在就应该准备好应对未来三十年美国的挑衅”，但这不会导致中国放弃其战略方针。

习近平有理由相信，直到 21 世纪 30 年代，他仍有望掌握实权。如果健康状况许可，在那之后他仍能在幕后保持很高的影响力。因此，考虑到习近平个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拥有的无法挑战的权威，习近平如何看待中国对美战略仍然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对美国的整体态度的关键。习近平的算计与中国体制过去长期的、根本的战略逻辑仍将大体保持一致：中国应该尽可能快速地持续积累军事、经济以及科技实力，但直到双方力量平衡中北京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之前，应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的经济或军事冲突。根据这种计算，这一转折将很有可能发生在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期。北京普遍认为，到那时华盛顿以及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国力上升的既成事实；又或者中国的实力将使其能够应对与美国爆发的任何经济或军事冲突，而不会有很大的失败风险。

按照中国战略思想的务实传统。习近平最深切的政治诉求是在 2035 年之前，在不开一枪，或至少不因来自美国的报复造成重大损害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的主要抱负。习近平打的算盘可能是，到这个 10 年末期，中国经济实力将大大增加，因此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或经济、金融、技术制裁的抵抗力也更强。在中国人自己看来，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那一刻，将是衡量中国采取单方面行动能力的重大事件。中国将举国欢庆，并将其作为中共几十年的领导智慧的证明。这也是为什么 2020 年代将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危险的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和区域军事力量将达到了一个广泛的新的平衡。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逻辑”所认为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关系将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既有的大国(这里是指美国)和新兴大国(这里是指中国)将会寻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相互试探的行动，包括采取单边的行动，作出不相称的反应，甚至使用武力先发制人。¹¹

综上所述，习近平对美国的态度与他最近的三位前任相比，有两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人们的认知中，中美实力的差距现在都已大幅缩小。其次，习近平的政治本色是在所有可能

¹¹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在他的书中把中、美比作崛起的雅典挑战斯巴达，并探讨了潜在的结果: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riner Books, a divi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的领域加快推行政策，而传统的中国战略家更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静待演变的发生。总之，习近平是一个急性子，他的前辈们则不是。习近平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加速”的做法导致北京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因为这会让美国对华战略过早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早于己方认为必要或可欲之时。习近平的批评者还认为，习近平为了适应其本人政治生涯的近期规划，而对中国实施国家战略的正常步伐进行了加速。这也是习近平在中国内部招致保守的、建制派民族主义分子批评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习近平不明智地采取大量公然触动美国利益的行为，不必要地激起了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反制行动。¹²同时，习近平也受到了中国体制内的自由派国际主义改革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放弃了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任何可能性。与此相反，中国的做法是企图完全取代这一秩序，这导致产生了一个来自全世界众多国家的广泛的反对者联盟。虽然习近平现在可能会寻求某些策略性调整，以减少他在国内政治上同时遭遇的两个派系的批评，但只要习近平还在任，中国整体战略方向就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尽管如此，这些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的断层线对中国当前国际战略的强度和方向产生的影响，仍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为应对习近平而制定的美国未来的中国政策时，应该认真对待的重要因素。

习近平的 2020 年代美国战略

¹²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McGregor's article, "Beijing Hard-liners Kick Against Xi Jinping'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Foreign Policy Hawks Concede That Current Strategy Is Winning China No New Friends," *Nikkei Asia*, July 28, 2020,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Beijing-hard-liners-kick-against-Xi-Jinping-s-wolf-warrior-diplomacy>.

基于这些假设，习近平未来十年的大战略，很可能与我们过去七年里看到的情况基本一致。习近平认为，这个战略是由中国与美国之间三组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驱动的：（一）美国绝不会像一个世纪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对美国那样，把“全球老大”的接力棒顺利地传递给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二）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不可调和的，这意味着美国永远不会将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视为合法；（三）而且华盛顿将继续阻挠中国争取统一台湾的努力。基于这些原因，习近平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发生冲突。虽然习近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更希望在不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况下确保中国的崛起，但同时作为现实主义者，习近平很可能认为中美某种形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来说，根本战略问题在于到底会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冲突。

因此，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来说，2020 年代很可能是一个深具挑战的十年。在足够多的刺激下，习近平终于把美国这只熊从其长期的沉睡中唤醒。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态度也开始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动员起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在近期之前，他们只是寻求保持相对中立以应对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状况）制定一项共同战略以应对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挑战。这项工作包括 2020 年末欧盟与美国旨在贸易、技术、安全、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建立联合战线而公开发表的几份建议书。¹³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是否会转化为能挫败中国的全球战

¹³ “EU Proposes Fresh Alliance with US in Face of China Challeng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9,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e8e5cf90-7448-459e-8b9f-6f34f03ab77a>; Orange Wang, “EU Ambassador to China Hits Out at ‘Wolf Warrior Diplomacy,’ Urges Beijing to Cherish ‘Deng Xiaoping Lega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13414/eu-ambassador-china-hits-out-wolf-warrior-diplomacy-urge>

略和地区目标的连续、有效和长期的战略？总的来说，中国正在打赌，这不会成为现实——至少是因为它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不再有能力持续地聚焦战略重点。然而，中国正在通过寻求对冲，以降低在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脱钩，西方的技术限制和金融制裁，甚至是全面的新冷战受到的影响，以避免受到实际的经济损失。

习近平和他的战略可能面临以下五种灾难性情境的排列组合或混合。

■ **大规模失业导致的国内政治动荡**，这可能是疫后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结果，中国国内的措施不能有效抵销其影响，或中央经济政策发生其他重大方向性错误。

■ **一系列自然灾害**，包括洪水、粮食安全问题，或新的大流行病破坏公众对该政权统治以及政令的普遍信任。

■ **应对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协调的一致性**，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为应对中国对其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这一威胁源自于习近平未能充分调整其 2013 年决定采取的新的强硬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 2015 年后采取的更加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所带来的影响。¹⁴

s; Stuart Lau, “German Politicians Call for US, Europe to Form United Front o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07141/german-politicians-call-us-europe-form-united-front-china>; Jakob Hanke Vela and David M. Herszen horn, “EU Seeks Anti-China Alliance on Tech with Biden,” *Politico*,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seeks-anti-china-alliance-on-tech-with-joe-biden/>.

¹⁴ 习近平在 2013 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市场改革方案。然而，在 2015 年中国股市暴跌后，这一方案基本被放弃，股市暴跌震惊了中国领导层，并导致他们再次拥抱国有企业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的国家控制。

■ **因习近平的战略误判导致过早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中国在与美国中国的军事冲突中未能明显获胜，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的整体公信力。

■ **上述因素的混合最终导致一场有组织的政变**，党内以习近平管理不善为由，对习近平进行政变。理由包括：疫情对中国全球声誉和战略地位的影响；放任在多条战线上制造敌人，而未能利用特朗普政府的缺陷在国际上赢得有分量的朋友、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挑拨离间并与美国的盟友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并且为经济长期停滞埋下了种子。

习近平将在可能的情况下，设法管理和减少这些风险，尽管有些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在这些制约因素下，中国未来十年的国际战略很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将拒绝国际上一切形式的人权问题压力，涉及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国内其他形式的政治和宗教异见，因为该政权更加坚定地通过它的镇压控制系统来维护这个列宁主义国家。中共认为西方对人权的兴趣是由偶发性的政治风潮驱动的，目前已经成功地被中国的经济诱导和外交压力所破坏。因为中国现在承受任何持续的外部制裁的能力要强得多，所以它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以前少了很多。

2.北京将加快对台海的军事准备，这是考虑到中国大陆正在军事上取得对台湾的绝对优势，以及美国将会在这个十年的末期把防线退回到第二岛链。这一目标将会导致美国因为担心彻底失败而不会选择未来支持台湾而与中国开战。这样一来，台湾除了在政治上服从于北京的统一进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3.中国还将继续加强其军事能力，包括扩大其常规力量，加强并实现战略核力量的扩张和现代化。推动这一进程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技术上的进步，以及美国为反制北朝鲜的突发事件而在东亚增加反弹道导弹平台的部署。

4.向印度洋地区的力量投射将加速，并得到其南亚、东南亚、东非和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军民两用港口和航空设施的支持。鉴于美国能源的相对自给自足，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海湾地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美在海湾地区的战略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5.北京将加快推进经济自力更生，这如前所述，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以及实现技术上对西方的完全独立。并且，利用这些新的中国科技产品、服务和平台，以取代美国在制定全球行业标准时的地位。此外，北京将力争在 20 年代末之前让中国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管制，届时中国金融市场将变得足够强大，足以抵消外国以经济手段对中国国内政治主导权施压之风险。

6.中方将在缓解气候变化的议题上重新与美国合作，这是乔·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后，在华盛顿更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中国认识到需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其国内民众对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关切。中国也看到新的气候变化行动对其未来的国际声誉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欧洲特别明显。更重要的是，鉴于民主党现在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一个重新稳定中美关系的可能的平台。

7.“一带一路”计划的下一步是将其巩固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集团，以支持中国野心，以便为建立未来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

秩序奠定基础。然而，鉴于中国的财政面临军事扩张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巨大竞争性需求，以及 2020 年新冠流行病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一带一路”计划的范围相较原来的巨大野心可能会有所缩减。

8.在东亚地区北京很可能在经济和外交攻势上加倍努力，以巩固其在柬埔寨、老挝、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把拉拢印度尼西亚作为未来十年的工作中心。

9.中国将致力于将首尔拉入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的势力范围，包括使韩国得出结论：北京是其应对朝鲜未来任何核武威胁的最佳选择。

10.北京将寻求预先阻止美国任何企图挑拨莫斯科与北京关系的倡议，包括任何为了对中国施加新的战略压力而缓和美俄紧张局势，甚至是美俄关系正常化的企图。

11.欧洲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决定性战场，因为北京将欧盟成员国视为中国商品、资本和技术来源的替代市场，并且欧盟对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的谴责不那么强烈，对中国在亚洲的安全挑衅不那么担忧。

12.中国对日本和印度的战略将是不确定的，由于过去与日本和印度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战略已经停止，传统的边境紧张关系又恢复了其主导双边关系的昔日地位。

13.中国将加快其迄今为止扩大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和外交领域影响的成功努力，中国既将这一地区视为主要的新兴市场，也将其视为在多边和国际机构中支持中国的雄心壮志主要的票源。

14.中国将寻求说服更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的行列，而不是继续与美国合作对中国进行制衡。这要利用实际上或人们所认为的美国的衰退来实现。总的来说，随着中国与美国竞争影响力的舞台，中国认为上述地区越来越成为非此即彼之地，并且将争取在这个十年的末期，将中美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平衡改变为对中国显著有利。

15.中国将更加积极地推进全球外交行动，在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包括远远超出中国自身区域以外，以显示其国家信誉和全球领导力。

16.中国将利用其在国际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翻国际机构中敌视中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倡议、标准和规范，或使之无效，其中人权和海洋法领域是重点。中国还将寻求利用这些机构的规范化程序，使中国的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概念和大规模的举措合法化。

17.最终，中国将寻求推进一种新的、分层的国际秩序和发展的概念，即习近平提出的刻意模糊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在所有这些举措中，通过从近期的“战狼”式外交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继续壮大全球外交干部队伍、情报网络和对外援助预算，中国希望努力使自己在外交和国际媒体宣传战略方面更加成熟。

很多人会批判中国的治国方略木讷、粗糙，实际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与十年前相比，中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仔细观察了其他国家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近期历史，系统地研究他们，并试图模仿他们的成功。不要低估中国学习和改造谍报术的能力。在这关键的方面，他们比苏联人更灵活。

技术战的中心地位

在所有这些考虑中，习近平可能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与美国正在展开的科技战很可能具备改变游戏规则的战略潜力。

这种兴趣尤其适用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发展的实力和脆弱性。习近平认为，人工智能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产业。目前，在比较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时（在人才、研究、开发、硬件、数据以及应用等关键领域），美国仍然是行业的领导者，中国次之，欧盟则已难望其项背。具体来看中美竞争态势，每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强项和弱项都不平均地分布在业界称之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堆栈”（AI stack）的一系列不同元素之间，而这是成为该领域全球领先者所必需的。这个“栈”是由以下要素组成：组织化的大数据，对大数据有效操纵的算法开发，拥有支持所需的数据处理计算能力的先进的微芯片，机器学习（包括用于处理最复杂的分析函数的神经学习系统），以及充足处理大量数据传输的数字蜂窝通信所必需的第五代(5G)无线通信技术。¹⁵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的主要优势包括在国内获取大量数据的机会，在数据访问上最低限度的法律限制，大量愿意并有能力对初级数据进行分类以便用于后续算法应用的低薪大学毕业生，以及阿里巴巴、百度等能够迅速地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开发商业应用的有活力的公司。中国的华为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全球 5G 的技术、系统、以及

¹⁵ 参见，例如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对中国相对优势和劣势的结论 in AI. Jeffrey Ding, *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 The Context, Components, Capabi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Strategy to Lead the World in AI*, Centre for the Governance of AI,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March 2018, http://www.fhi.ox.ac.uk/wp-content/uploads/Deciphering_Chinas_AI-Dream.pdf.

网络的国际领导者，它也拥有自己至关重要的人工智能子公司。然而，中国的许多优势都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宽松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北京能够不受限制地从来自美国、韩国和台湾的世界最先进的供应商处进口半导体产品以满足其需求。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才能聚焦于快速发展的 AI 商业应用的开发，并成功地把国外供应商辛辛苦苦作出的研发成果货币化，而不用将辛苦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计划放在首要位置。中国的并购和股票市场鼓励即期利润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而在美国，科技公司担负明显更高的长期沉没成本和研发投入比例被视为正常现象。这些趋势的总体结果是，中国对芯片的国际基础研究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导致中国比美国行业领先者落后了三到七年的时间，具体取决于芯片的类别。

然而，在美国开始调整出口和外商投资规则，以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半导体产业和其他先进技术后，这种策略已经土崩瓦解。2018 年以来，随着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列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实体控制名单，美国的人工智能政策格局发生了 180 度的转变。在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豁免的情况下，这份名单实际上禁止了向中国企业出口含有任何明确的美国成分的半导体。此外，2018 年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管理法》（FIRRMA）授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大的权力来阻止交易，而 2018 年的《出口管制法》则进一步限制了敏感的美国技术出口。¹⁶

¹⁶ “CFIUS Reform Under FIRRM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In Focus article IF10952, updated February 21, 2020, accessed November 28, 2020, <https://fas.org/sgp/crs/natsec/IF10952.pdf>; “Export Controls: New Challeng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In Focus IF11154, March 22, 2019, acce

除了这些措施外，特朗普政府还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发起了一项阻止华为 5G 网络推广的运动。尽管这一运动最初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抵制，但此后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支持。中国更担心的是，美国将其国内执行的对华为的半导体出口禁令，扩大到其他国家依赖美国软件和技术第三方芯片厂商，以强化其政策效果。这些不同的措施给习近平政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如何填补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缺口。要么中国必须接受更低端的国产芯片作为其新的行业标准，或者它必须寻找其他的国际先进芯片来源。另外，北京还可以倾注国家资源，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迅速制造出一个在中国自身内部全面整合的“人工智能堆栈”，以抗衡并超越美国。尽管障碍重重，习近平还是选择了最后一种策略。

因此，问题是，习近平的这种做法能否成功——不仅要超越美国人工智能产业，而且要在很可能提升中国的整体国民经济竞争力和先进军事能力的领域确保飞跃性优势。这将需要通过国营科研机构、军方和私营部门之间亲密的、非正式的、互利的合作，以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过去中国缺乏这样的文化。中国还需要一种革命性的新方法来激励人工智能研发、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估值。如果，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推广其大肆宣传“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即邀请像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入股“激活”国企，或者更糟糕的是，让国有企业对私营经济进行投资——其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尽管如此，鉴于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中国当局已经把大规模的财政资源分配给了这项任务。中国认识到，这些资本很多

ssed November 28,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154>.

会被错误地分配，但北京认为这是在中国体制下取得部分进步应付的代价。

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是一个十年期的长期事业，而不是近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不过中国的战略决心现在已经很明确。中国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华盛顿的出口禁令全面实施，美国半导体产业也将受到影响。美国科技产业本身长期依赖中国市场，才有了自己的历史性盈利水平。此外，正是该行业的出口收入为其在半导体领域世界领先的研发再投资提供了资金，以使美国企业保持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如果这部分出口收入被切断，美国政府将不太可能出手补贴这些企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一定的信心，未来几年，美国半导体供应商的产品和技术将继续大量“外流”。

由于这些复杂的原因，中国与美国就人工智能领域将来十年的主导地位的竞争赛——跨越研发、创新、商业应用和军事部署领域——仍然是势均力敌的。在当前更广泛的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的这一特殊的技术竞赛之结果尤显其重要性。

建立长期的美国对华战略

在制定一项有效的“中国战略”，以保护和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时，美国必须遵循其用以打败苏联的相同原则。然而，这一战略必须根据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国家和迥然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进行具体调整。这种目标只有理解了何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才能实现，并且要同美国的主要朋友、伙伴以及最关键的正式盟友共同完成。同样重要的是，用以长期指导该长期战略的组织原则，以及拜登当局在执政前六个月内发展、制定并实施的中国战略的详细内容的组织原则，必须十分明

确。政治上的奇思妙想、聚焦于调动群众的修辞和行政当局的混乱阶段已经过去了。特朗普政府很好地敲响了关于中国的警钟，其宣布的“战略竞争”新战略很重要。然而，特朗普政府对这一战略的执行却很混乱。现在受到威胁的是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这一秩序过去七十年来是由美国建设，并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维护的。

界定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美国战略的基石必须是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定义。这应该是一个有纪律、有时间限制、机构间密切合作的过程。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但其还应经所有相关的国会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批准。然后，这个两党共同得出的结论应被纳入能赢得今后各届行政机构之持续接受的总统行政命令中。

这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汇编应包括以下内容：

- **保护美国不受核攻击的威胁，以及其他任何类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的威胁，包括来自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

- **确保美国的核保护伞可信地扩大到条约盟友，同时履行《联合国宪章》以及个别条约安排中概述的美国对盟友的其他安全义务。**

- **维持美国在同四十七个条约盟国组成的全球网络内的行动效力，以及为维持这一网络，获得必要的国内和国外的政治支持。**

- **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美国对所有战区对手的常规军事优势，包括所有的战区，所有现有和新兴的军事技术、平台和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空间，从而防止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跃进。**

- **在印太地区保持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以便在发生问题时美国能取得武装冲突胜利，从而阻遏中国任何此类军事挑战。**

■ **武装台湾，使其能够与美国一起遏制任何军事攻击、网络攻击或海上封锁**，系来自解放军之相关攻击封锁，并在中国采取任何此类行动的情况下，要在军事上做好准备以击败解放军。要认识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的安全保证，包括对条约盟友的安全保证的公信力将崩溃。

■ **抵制北京侵蚀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努力**，及其相关专属经济区，认识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破坏 1951 年美日安保条约。

■ **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任何进一步的领土主张**，并认识到做不到这一点，将会使美国为保护其全球利益而维护的航行自由准则无效，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盟国心目中的信誉。

■ **保持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国家经济体的地位**，要以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如果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要同主要民主国家盟友建立有效的经济共同体，以保证整体经济规模超过中国。如果不能保持经济优势，将导致中国的强硬对外政策举动进一步加码。

■ **保持美国在所有重大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包括人工智能领域，或通过与关系密切的美国盟友联合领导来实现这一目标。

■ **维持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包括在数字货币市场和其他新兴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平台。

■ **防止灾难性的全球气候变化**，确保所有国家根据其历史排放规模和未来预期排放规模采取必要的国家行动，以保持全球本世纪气温上升幅度在 1.5°C 以内。

■ 捍卫、扩大并在必要时改革现行的基于规则的的自由世界秩序，以及相关的美国 1945 年以来建立的多边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基础。这包括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遵循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市场开放原则的全球经济体系；以及以三项多边人权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法律、人道主义和人权秩序。

为建立国家长期战略就基本组织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美国新的中国战略必须建立在核心组织原则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存在的基础之上。要铭记从 1948 年的遏制理论出台到 1989-1991 年的苏联解体的终极事件发生，美国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打败苏联。要记住，2049 年才是习近平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时间，到那时，中国将夺取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中心。因此，美国采取的原则必须保持不变。同时认识到，确切的政策阐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件建议用十项核心原则来指导美国未来的中国战略。

首先，美国战略必须建立在美国权力的四个基本支柱的基础上：国家的军事力量；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的地位；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因为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是未来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对个人自由、公平和法治这些价值的维护，尽管最近遭遇了政治分裂和诸多困境，但美国将继续为之努力。虽然将有争论不休的战略细节，但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根，都会对整体战略带来巨大危害。对华战略取得成功的一

个前提条件是，这些支柱中的每一个都得到积极培育和加强。否则，这个战略就会失败。

其次，美国的战略必须从关注国内经济和体制上的缺陷开始。中国的成功崛起，是以一项缜密制定，并持续实施了三十五年的战略为基础的。这一战略找到并着力在制造业、贸易、金融、人力资本等环节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现在的重点则是科技领域。中国已经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管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仍然存在着特有的弱点。美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不实行计划经济。然而，需要克服的问题清单是冗长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崩溃；学校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学上的失败；无法就平衡的、长期的移民战略达成一致的意见；以及美国体制在解决基本的国内政治分歧上的无力。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和弱点，中国将会取得胜利。

第三，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立足于国家价值和**国家利益**。这也是长期以来在世界的眼中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捍卫普世自由价值和自由的国际秩序，以及维护美国的全球权力，必须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两大支柱。美国必须就一个简单的论点达成一致，即维持后者(即：美国的权力)仍然是维护前者(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所必不可少的。这个道理击中了中国战略的核心。它明确地试图摧毁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因为在国内北京长期将这视为对共产党政权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然而，如果中美战略竞争简单地变成了美国力量和中国力量之间的比拼，目标是为了保护每个国家的核心国家利益，最终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眼里，这将变成一场涉及民族、文化、种族乃至不同文明的狂热的全球霸主地位之争。考虑到围绕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问题进行广

泛的基于价值观的辩论的政治危险，习近平已经在他的国内和国际言论中接受了一种文明社会的论点，其中他大胆地把中国包装成一个的“东方”的新世界，与腐朽的“西方”旧秩序并列。这种方法巧妙地运用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语言以掩盖习近平潜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性质，这就是以专制资本主义取代民主资本主义，这已是发展中国家的公认准则。

更广泛地说，美国将无法建立起一个积极的国际联盟，可以这样讲，来抗衡中国，如果仅仅立足于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权力。在一些第三国可能会有一场关于哪个国家作为未来首选的超级大国（美国或中国）可能会更善良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支持美国的一方可能仍占上风。然而，相较于追求美国的权力和利益的简单、狭隘的原始叙事，更广泛地捍卫国际自由主义秩序思想和理想，以及它所依赖的多边体系，将更有可能赢得亚洲、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治和舆论支持。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新的中国战略的公开名称可以简单地称为“保卫我们的民主政体”。这是符合逻辑的：“保卫”是指国家机构通过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实行积极的行动；“民主”是指众多国家共同致力于建立开放政治、开放经济、开放社会、和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治这一整个理想；“我们的”，意味着这不仅仅是美国的事。

第四，美国的战略必须与主要盟友充分协调，这样才能确保应对中国时采取统一行动。这并不是为了让盟友感觉良好或让盟友比现在感觉更好。这是因为美国现在需要他们以获胜。如前所述，中国最终把很大的重心放在算计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上。现实情况是，在 2020 年代，随着中美实力之间的差距缩小，最可信的能改变

这一轨迹的因素是，美国能否在其重要盟友的帮助，让国力更加强大。比如说，在亚洲方面，如果能得到二十国集团在该地区的其他三个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帮助，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将大大提升，其在亚洲的战略平衡将显著改变。

从全球范围来看，如果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德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加拿大的帮助，战略平衡也将迅速改变。美国主导的联盟最终还可能在更广泛的第二层战略同盟中，纳入其他重要的战略伙伴，如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要让这种全球性的筹划变成现实，而不仅仅存在于概念上，就需要所有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以建立一个全面、综合、泛在（panallied）的中国战略。

由于美国在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现有联盟结构的历史使命和地理重点的不同，这种程度的合作以前从未发生过。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多边联盟，其矛头主要对准苏联，苏联解体后则是俄罗斯。而大体上而言，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本质上是双边的，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主要集中于中国。

因此，美国要与盟友实现对华政策的共同意图有着相当的难度，但绝不是不可能的。目前形势朝着这个方向已经有着相当的进展，并因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而加速。对于其他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及传播的责任问题的指责，中国的反应可谓咄咄逼人。考虑到中共担心此事牵涉到其国内外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这些反应在某些方面近乎于一种新型的心理战。2020 年的大流行病为美国再次巩固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创造了独特的战略机遇，而迄今为止被华盛顿白白地浪

费了。然而，考虑到全球对于中国在疫情上所扮演角色的怨愤之深，这一机遇尚未被彻底错过。要形成一种泛盟友的对华政策，其难度是巨大的。尤其是经济上中国市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越发成为它们与北京保持积极关系的动机。前不久中国同 14 个亚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凸显了这一情况。为此，（对华新举措）应从少数大国开始，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在战略上应有相当分量。与主要盟友一起做这些细致的工作，对于促使中国未来国际行为的任何根本性改变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北京得出结论：力量平衡并非不可避免地朝着它的方向发展。

第五，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设法考虑其主要盟友和伙伴的更宽泛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而不是假设它们会出于好意而采取一种共同、协调一致的对华战略姿态。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善意依然存在的。这些盟友也知道自己从美国提供的终极安全保障中受益，但除非美国应对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盟友主要贸易伙伴的事实，否则这一潜在的现实将越来越强地影响到（美国）传统盟友挑战中国越发强硬的国际行为的意愿。以美国的紧密盟友澳大利亚为例，2019 年，中国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三成。如果因为地缘政治危机的缘故，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说不，其结果或许是后者令人吃惊的 8.5% 的经济增速将出现收缩，因此经济上产生衰退，当然也会给在任的政府造成重大的政治后果。澳大利亚的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对亚太每个国家而言，中国即便不是最大贸易伙伴，也能排第二。一个不那么舒服的地缘政治事实是，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一块巨大的磁铁。不单是全球出口的问题（中国目前占全球 16.2%，

美国以 10.6% 位居次席），在全球商品进口方面也是类似的状况，中国占全球总量的 11%，这意味着大多数大公司在制定可靠的发展战略时不可能轻易地无视中国市场。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尚不是同样的景象，中国占全球 9% 的外国直接投资（inbound FDI），落后于美国的 16%，然而在 2019 年，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outbound FDI）占全球 8.9%，已经可以与美国的 9.5% 相匹敌。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技术创新及产品标准方面。而在大流行病而引发的衰退将在多大程度上加速这一趋势，目前还不确定。换句话说，单单是中国经济的分量所产生的向心力本身，就对未来（美国的）同盟在因应中国时的团结构成结构性的挑战。这已经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中心目标：成为全世界不可或缺的经济体。

有鉴于此，美国唯一符合逻辑的政策选择将是开放经济，接纳自由贸易，如果有可能开放与其民主盟友及整个自由世界的投资协议。这必须建立在充分互惠的基础上。这也是为何奥巴马政府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以及类似的跨大西洋的协议代表了关键的也是唯一的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它为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补上了必不可少但却缺失了的经济成分。这也是中国为何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样的举措。中国的高层立刻就领悟到了这些协议的重要性。北京认识到，这样的贸易集团将成为抵消其全球战略的力量，因为北京战略的基础在于让全球在经济上越发倚重中国，假以时日让其他国家在外交上顺服，并最终瓦解美国的同盟。对美国的大战略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经济体融合为一体的北美经济体。¹⁷这

¹⁷ 2018 年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

不仅对美国自身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其重要性还在于逐步向民主世界的其他国家开放这个由五亿人组成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综合市场。同样，这也需要并且只能在各方互相全面开放市场的原则上才能实现。美国经济战略的这一深刻变革将要求华盛顿继续在全球经济自由化的议题上发挥历史性的领导作用，从而逆转其近来的保护主义路线。因此，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它并不是简单地寻求压缩中国的经济机遇，而是要认识到美国必须要利用其全球影响力为自身及主要民主盟友开拓新的经济机遇。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打造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而是要打造一个自由经济体的联盟。如果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维度得不到处理，本文中推荐的其他对策将无法施行。放眼全球，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内政中那句“笨蛋，是经济问题”的名言仍然有道理。

第六，不管是否愿意，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需要再平衡。有效地巩固美国同盟至关重要，未来分化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同样如此。过去十年放任俄罗斯在战略上完全滑入中国的怀抱，堪称美国各届政府在地缘战略上接连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这里并非要说就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而言存在任何显著长处，只是要说，对美国构成主要的战略挑战的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这个情况在过去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很清楚了。俄罗斯当然会给美国利益制造麻烦，但其本身已非重大战略威胁。然而，俄罗斯对未来美国战略的重要性，可以从普京和习近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极高水平的战略共管（strategic condo

时被简称为“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还不够。虽然降低了贸易关税，增加了市场准入，并提供了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但还达不到前述的无缝自由贸易区（更类似于欧洲共同市场）。

minium），以及它给中国增添的战略筹码中窥见一斑。现在，中俄的双边合作涵盖军事、情报与国安、能源、贸易及投资，还有包括在安理会的外交政策合作及其他形式的多边合作。最重要的是，这种结盟可以让中国免却北顾之忧，因为在过去四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有着漫长边境线的中俄曾处于敌对关系。随着中俄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军事、外交及领导资本空出来之后，可以用于别处。这对美国全球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

然而在某些方面，莫斯科和北京紧张关系依然显著且持久。它们在于：过去数个世纪，中国割让给了俄罗斯包括满洲（Manchuria）在内的广大的领土，俄罗斯对中国复仇的念头感到忧虑；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数量少，且不断下跌，南面的中国则人口众多，而中国官方或非官方的移民强化了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焦虑；中国在中亚数个共和国（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的经济和战略存在；中国在俄罗斯另一个势力范围北极的蓄意谋求利益，还自我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在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对森林的采伐及其他非法的资源采掘型行业的存在引发了政治后果，而这些资源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求，其背后往往有着腐败和来自中国的黑金。

有鉴于此，美国应该设计与莫斯科关系的显著的再平衡。俄罗斯当然不会成为美国的朋友或战略伙伴，更别说是盟友。自 2014 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首次制裁已经让俄罗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此，俄罗斯可能会抓住任何重启与华盛顿关系的机会，以此增加对北京和华盛顿的影响力。与中美两国越发不平等的关系让莫斯科愤愤不平。不管怎么说，阻止莫斯科与北京的

关系进一步深化，甚至成为只差一个名号的盟友，符合美国的长久利益。要这样做，美国就应该在俄罗斯的公共舆论有所作为，揭示中国的践踏俄罗斯的经济利益、政治感情和国家尊严到了何等地步。美国必须做好向莫斯科做出某些妥协的准备。要把中国带到战略核力量扩张与现代化的谈判桌，得让步才能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在朝鲜问题上或许也应如此。

第七，美国及其盟友的有效中国战略的核心焦点必须是针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内部断层，特别是关于习的领导地位。如前文已指出，美国战略中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攻击，因此让习能凭借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明的自豪感的吸引力，在中国政坛汇聚同舟共济的力量。过去同样重大的错误是笼统地攻击中共本身。中共有着 9100 万党员，加起来比德国人口还多。然而，政治现实是，党内对习近平的领导存在极大分歧，由于前文所述原因。包括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被习近平的政策方向和政治领导风格极大地激怒了，他们现在担心自己的命运和家人未来的生计。在这种混杂的声音中，特别具有政治毒性的是国际媒体报道的习近平家族及其内部政治圈子成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聚敛财富的陈述。当断层线确实存在，把整个中共成员当成是铁板一块的单一目标对待，未免太缺乏谋略。这样做只会再次让中共团结力量，这一次则是捍卫整个中共成员的利益，保障其集体的生存。因此，任何宣称“推翻中共”为目标的策略完全是弄巧成拙。因此，公众话语和操作性的焦点应该是“习的党”。这正好命中当今中国政治中断层线的中心。

有人会质疑这种看法，理由是领导层的变动会导致某种更糟的情

况。这不太可能，因为中共党内的批评在于，习把国家和经济带得太左，而其民族主义和国际上的操持又有点过头，让国家孤立无援。因此，任何领导层的变动更可能是顺应政策变动，缓和有所过分的政策。如果这样的变动并未发生，那么（美国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对于习的压力，使其自动缓和中国的政策，或是收回其国际上的一些举措。不管其中哪一种，都比中国当前的发展轨迹要好。还有人会说，除非中共彻底消失，代之以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否则美国无法应对源自中国的战略挑战。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它假定导致中共倒台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实现的。如前所述，因为其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使命所包含的深刻的内部矛盾，中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倒台。然而，正如苏联的旧例，那样的情况只能是中国内部的动力所致。外部的压力可能要么促进要么阻碍这种长期的内部变化的过程，但是任何外在的试图推翻中共的举措更可能阻碍而不是加速了这一目标。这一举措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毛泽东之后习近平之前的五位中国领导人，不管他们为自己国家设想的长远抱负是什么，他们都能有效地与美国合作。最后，如果现有政治体系出现“内向爆破”后，这种推翻中共论让我们不去判断中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这方面，普京的后共产主义形式的俄罗斯超级民族主义（übernationalism）堪为前车之鉴。因此，美国对中国当今战略的政治和政策应对都应该聚焦于习本人。

第八，美国战略要战胜中国战略，决不能忘记其内在的现实主义性质。中国的领导人尊重实力，鄙视软弱；他们尊重连贯性，鄙视游移不定。中国不相信战略真空。按照北京的现实主义世界观，要么是

美国存在并占据战略空间，要么就是中国。不可能出现中立的选项。尽管北京公开地呼吁双赢，批评零和游戏，但就实际运作的策略而言，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零和关系。北京总是通过美国的所为而不是所言进行分析。中国预期别国政府在战略意图上也会像中国一样说一套做一套。如果中国抗议，说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麻木不仁，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一定要不为所动，因为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和国家的花招，目的是给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选民以自由民主国家令人不快，不通情理和极端之感。中共策略背后的算计都是实力：如何韬光养晦，如何夸大其词，如何施加影响，什么时候运用，明着用还是暗着用。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次要的。

第九，美国战略需要明白，中国当下对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仍然高度紧张，但未来数十年随着军事平衡的倾斜，这种态度将会改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而中国不能决定性地获胜，那么考虑到中共这些年来对于中国崛起的宣传，则习或许会下台，当局的整个的政治合法性都将倒塌。然而，随着未来多年内，地区军事平衡朝着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倾斜，中国人对于可能战败的焦虑在逐渐减弱。这种分析适用于南海和台湾的意外事态。但在东海的局势上，情况就不那么符合，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敌手，而如果败给日本，在政治上的对中共在国内的信任的打击更大。在南海，对于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美国需要有审慎的战略判断。以下推荐的只是一种可能的路径。在台湾的问题上，如果中国对台湾发起军事或准军事行动，而美国并没有任何回应，不管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或是对台湾防务提供足够的支援，那么美国要明白，其在整个

亚洲的战略信誉将会消失殆尽。这将是北京、台北以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集体判断。如此一来，美国余下的对华战略的效果都将不复存在，随着在台湾问题上的“胜利”北京在国内外政治上的傲慢将成为其国际行为的新的推动力。为避免这一点，构建台湾有效的防务和针对中国的经济威慑必须成为美国战略的核心要务。对未来的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中国对台湾来硬的，美国势必要作出回应，这种决断将伴随着诸多风险，而上述策略虽不能完全规避这种风险，至少能使之减少。

第十，对习而言，同样也是“笨蛋，是经济问题”。除了未来在军事上失败的风险，对习而言最大的致败因素在于经济上出问题。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自文革以来，实现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成了中国老百姓与共产党之间未曾言明的社会契约中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为何自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习自身的政策变更所导致的），习在政治上更容易受指摘。当然，只有经济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其直接的政治影响才会在党内高层显现。这种情况可能因以下几种局面而出现：中国出口进一步萎缩；新冠肺炎回潮，对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就业产生影响；银行业已债务累累，私营企业债务违约更造成金融上的崩溃。重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当今最大的政治考量。美国在拟定对华战略时，应该把这一点理解透彻。

总而言之：有效的对华战略都有哪些内容

着眼于前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美国战略长期发展的组织原则，新一届美国政府最紧要的任务是详细制定一种有效的对华战

略应该包含的可操作的内容。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其内部商议要改变中国某项政策或行为时，要做到足够明确。美国必须要确定自己要威慑中国的哪些行为，以及当威慑失败时，哪些行为需要美国不惜以直接的军事、经济或其他对策试图去挫败。这些手段并非相互排斥。美国任何有效的战略都需要审慎地将这些手段组合起来。首先，美国应该确定决不能让中国逾越的红线，这非常重要。这对向中国及美国盟友传递信息很关键。第二，守住这些红线，不管是通过政治上的说服、积极的威慑，或者运用经济、金融手段乃至诉诸武力，是维系美国的全球威望及战略信誉的根本保证。相较于传统的红线，战略模糊的问题就在于，例如针对（大陆）对台行动的威慑，以及近期在南海的威慑，这种模糊总是被北京视为体现了美国的软弱。反过来又助长了中国的冒险主义。第三，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在内部审议中应该明确，自己准备采用何种特定的手段，来威慑或是挫败中国特定的行为。第四，要明确中国的哪些行为虽然招人厌恶，但在美国的总体战略中仍然是可以容忍的，由此美国才能积极地与北京竞争。这也很重要。最后，美国的对华战略还要明确，在哪些领域保持与中国的合作，仍然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一分析过程应该产生一致认可的清单，开列（中国的）哪些行为不能容忍，哪些行为需要劝阻，哪些行为又可以接受。而如何分配美国及盟友的资源，以便让对华战略中确定的特定行为目标产生实效，这一分析过程同样要为此提供基础。例如，鉴于习在 2015 曾公开宣称中国无意在南海的人造岛上搞军事化，美国应该决定让习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美国未对背信的行为作出回应，只会再一次被北京

视为是软弱的体现。在南海方面，美国应该确定其红线是依据何种情形划定，是中国现有的部署，新的军事部署，进一步的造岛活动，还是中国针对其他声索国的资产（assets）的军事、准军事或者是“灰色地带”的行动。划定符合实际的红线很困难，但划定这样的红线是必要的。于是，就必须要有外交和军事上协调的准备，以应对特定的不确定事态。现在这种对于中国的目标行为进行分析、澄清与分类，以及准备好一致同意的对策，就显得绝对地必要了。

基于这样的理解，美国战略中的操作性内容应该包含五个方面：

（1）重建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措施；（2）美国的红线；（3）普遍认可的战略竞争领域；（4）持续合作的领域；（5）在国际国内全面加入同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

重振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举措

本文并未纯粹地对美国的战略优势与劣势进行评估，而正如美国对中国的评估一样，需要拿出同等的严谨来剖析美国自身。这样的评估对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问题尤其有针对性。不解决这些问题，针对中国的宏大战略（经济的，外交的或是军事的）就不会有多少实效。需要牢记的是，中国对未来战略路线的算计，将极大地取决于对哪些因素助推美国实力的评估。北京希望了解美国在国内有没有弥补国内社会上的、经济上的弱点的政治决心。如果未来美国的经济垮了，加上人口、生产率以及整个经济的增速处于较低水平，则支撑其未来全球利益所需的军力的程度与规模，美国未必负担得起。在科技创新上，美国也不见得就能保住其领导地位。而长期以来科创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因素之一。当 1947-48 年间乔治·凯南写作“长电报”以及“X 文

章”（译者注：1947 年凯南以笔名“X”在《外交事务》发表题为《苏联行为探源》一文）之时，他的分析集中于哪些因素最终将导致苏联的覆灭，当时他的假定是美国的经济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取胜。然而今非昔比，当时的那种假设如今已不再可行。眼下任务已经超出了关注中国内部的弱点，也要延伸到美国的弱点。若不两者兼顾，美国将会失败。

要应对习时代的中国，美国得制定有效的战略，其中一部分在于核心的国内任务，这份清单让人很熟悉。这些任务是结构性的，长期的，其红利需要在十年或更久后才能显现。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 扭转对关键经济基础设施（包括 5G 移动系统）投资下滑的趋势。

- 扭转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大学以及基础科研的公共投资下滑的趋势。

- 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的主要范畴（包括人工智能）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

- 就美国未来移民的性质和规模形成新的政治共识，以确保美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保持人口的年轻化，避免威胁其他发达及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人口内爆（demographic implosions）问题，同时留住世界各国来美学习的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

- 修正美国的长期的预算轨迹，保证美国国债最终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以适应新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避免发生通胀危机并弱化美元的地位。

■ 解决或至少是减弱目前政治体系、组织和文化中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会损害美国协商、制定并坚持长期决策的能力，而这种决策是美国巩固历史优势，开拓新机遇的基础。

■ 解决未来国家政治决心的关键问题，以捍卫、建设乃至扩张自由秩序——并证明中国对于美国的决心正在衰退的判断是错误的，而非容许或是欣然接纳孤立主义的新浪潮。这种孤立主义思潮只会不可避免地让美国向内而不是向外看。

鉴于当前美国政治体系的诸多掣肘，这看起来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清单。然而在 1941 年美国需要进行动员，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面临苏联的核挑战时，普遍的政治观点正是这样。就认识到的范围和规模而言，如今的挑战并无二致。美国需要就其弱点的关键领域形成新的跨党派共识。如果以派性的眼光来看待对核心挑战的政策回应，或是任由中国腐蚀美国的政治系统，挑动美国人内斗，那么付出的代价的太大了。上述清单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应视为事关国家安全，而不是内部政治分歧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内容。因此，上述七点应该由白宫在政治和政策上牵头，并得到国会领袖的全力支持。这种领导力必须成系统。国内改革的议程必须纳入白宫幕僚长的职责范围，以跨部门的方式落实这一向内看的国内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议题应该与白宫国安顾问牵头的议题平行，国安顾问负责落实新政府对华战略中向外看的国际维度。

威慑并阻止中国跨越美国的红线

美国的红线清单应该简短、集中且可执行。多年来，中国的战略在于模糊这些红线，否则将过早地陷入与美国公开的对抗，这不是北

京想看到的。因此，中国不会在公开宣称的战略中展示其行为的实际变化，因为知道这样做会触发美国的回应，所以只做不说。几十年来，北京早已知道华盛顿的多数政治辩论，无非是体现为公开的政治说辞，而不是私底下的政策行为。中国还部署了多种手段来，确保其党政机器在全世界的作为可以有说得过去的托词，尽可能使用软资产而非硬军事资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中国在南海广泛使用其渔船队、海岸警卫队船只和其他船只，而非海军舰艇）。

因此，美国必须非常明确中国的哪些行为需要威慑，以及威慑无效后，哪些行为会引发美国的直接干预。这些必须通过高层级的外交渠道毫不含糊地传递给北京，以为警示。而只有当威慑无效且美国的报复性行动已经开始，这样的高层沟通才应被公之于众。为了获得美国民意和盟友对美国回应的支持，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

这份红线清单应该包括如下要素：

- 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使用核武器、化学及生物武器的任何行为，或者是朝鲜有如此行为，而中国未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加以阻止
- 中国对台湾及周边岛屿发动军事攻击的任何行为，也包括进行经济封锁或是对台湾公共基础设施、机构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
- 中国在日本武装力量维护尖阁列岛主权及东海的专属经济区时，对其发动攻击的任何行为
- 中国在南海进一步填海造岛、武装化岛屿，针对其他声索国部署武力，或者是阻止美国及其盟友的海军实现充分的航行自由的任何重大敌对行为
- 中国攻击美国条约盟友领土及军事资产的任何行为

为保障这些红线，美国（及其盟友在恰当处）所需部署的资产各不相同。这些事务不应进入到公开的讨论。然后，这样的政策逻辑仍然是清晰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向中国政府表明这些红线的重要性，并且威慑乃至挫败中国触碰这些红线的任何行为。中国可能会对这样的战略上的透明度感到吃惊，因为中国已经逐渐习惯于一个不愿意与之对抗的美国，即便是对抗也只是零敲碎打。不出意外，中国会探究美国对于新战略的执行到底有多认真，办法是确认整个链条中最弱的一环。美国应该为这样的打探做准备。当然，要记住的是，所定的大多数红线会直接作用于中国内部对习是否逼迫美国太甚的讨论。

重大国家安全考量的诸领域

对美国来说，还有一类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美国作出反应，但不一定是军事性质的。这些国家安全利益虽非生死攸关，却也是至关重要。在美国的工具箱中，有多种工具可以用于这些目的，不仅可以向中国领导层的高层发出已经越界的信息，还可以真正地让中国感到相当的痛。再说一次，这些关切应通过高层私人外交提前传达。

这一清单包括：

- 中国继续拒绝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实质性的双边或多边裁减战略核武器谈判；而这样的谈判的目的是为中国的核现代化和扩张计划设定上限
- 中国威胁美国空间资产或全球通信系统安全的任何行动
- 中国对任何美国或盟国政府的重要经济、社会或政治基础设施的重大网络攻击
- 任何针对美国条约盟友及重要战略伙伴（包括印度）的大规模

军事或经济敌对行为

■ 在中国境内对任何群体实施的灭绝种族或危害人类罪的行为

如上所述，美国的战略红线清单应该是简短的、集中的、可执行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守不住这些红线，将被北京解读为美国软弱的又一例证，并鼓励中国进一步越界。事实上，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私下里对北京近年来一系列广泛行动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感到震惊。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式嘴皮子”（“American speechmaking”）的傲慢和蔑视。因此，这些官员的习惯性行为是，尽可能用力，直到遇到具体的阻力，然后，也只有在那时，才会调整路线，直到找到另一个缺口。可见可执行性是战略可信度的关键。因此，美国采取渐进式应对措施的基本原则是，首要的是校准明确的红线，然后是这份国家安全重大关切清单。

中国期待着有朝一日不再害怕美国对其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在中国领导层的心中，经济体量比美国更大将是这一算计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可能在这个十年末就会到来，届时它很可能会使北京得出结论，认为可以放心地无视美国未来的任何金融和经济制裁威胁。另一个类似的节点在习心中何时会到来，仍是个未知数，即美国威胁对中国侵犯美国红线或其他重大安全利益采取军事行动的持续效力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两个节点（经济或军事的）都还没有到来。美国尚未被视为“纸老虎”。中国对美国国力未来演变、使用国力的意愿和有效威慑的决心等方面的评估，鉴于中国在此期间的行动，将会对中国未来的战略路线产生影响。

声明战略竞争的诸领域

遏制中国的某些战略行为，尤其是安全领域，是一回事。在危及美国其他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惩罚中国的其他行为是另一回事。然而，允许更广泛形式的战略竞争，特别是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是全面调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单一的战略框架内拥有这三个范畴是可能的。

列入“战略竞争”的理由是为了处理某些领域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两国政策议程明显冲突，但据判断，这些冲突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即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之外的方式，或以其他强制（胁迫似乎有些贬义的感觉）性或明显惩罚性措施的手段。据推断，虽然这些领域所涉利益是重要的，但它们既不事关生存问题，也不是至关重要。当然，这些利益仍可能牵涉到为最终使用武力做准备的政策活动，例如与在军事和经济方面作长期准备相关的领域。或者说，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可能包括不会涉及使用致命手段的领域。然而，所有这些战略竞争领域的共同特点必须是相信美国能够并将取得胜利，美国的基本实力和价值观念仍能在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些对华战略竞争的领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维持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现有军力水平（否则会使中国认为美国已经开始从其联盟承诺中撤退），同时也要让军事理论、平台和能力现代化，以确保整个地区的强大威慑力。
- 稳定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鼓励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同样保持稳定关系。
- 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完成全面可运作的四边安全对话，促使印度放弃对这种安排的最后政治和战略保留。

- 促进日韩关系正常化，防止韩国在战略上继续向中国靠拢。
- 优先考虑美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经济发展、外交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盟友泰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以防止东南亚对中国的进一步战略偏移。
- 保护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 保护美国和盟友的关键新技术不被中国收购。
- 尽最大可能促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成一个五亿人的无缝市场，以加强相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实力。
- 重新谈判《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然后加入该协定。
- 与欧盟谈判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并加入，以及关于技术或其他问题的其他潜在协定。
- 与伙伴及盟友一道，通过改革后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中国落实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家补贴、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承诺。
- 改革和振兴世贸组织、其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贸易法的完整性，而不是允许进一步逐步向全球保护主义发展。
- 与美国的盟友一起，对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便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发展其国家基础设施的有效手段，从而鼓励利用世界银行（包括其透明的管理标准）作为替代“一带一路”的可靠手段。
- 振兴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和国际机构，以作为全球政治治理的基石。
- 重建美国国务院，包括其运营预算和人员配置水平，以便能够

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进行外交竞争。

■ 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和已建立的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增加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同时与美国的盟友一道，协调提供全球援助，在外援上维持超越中国的地位。

■ 在符合现有国际条约的前提下，加强多边人权制度安排，对中国国内的人权实践和共产党的国际政治合法性保持多边施压。

这些领域本身自有其重要性，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一项可操作的战略，力求在每一个领域取得胜利。中国希望通过其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的结合，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调整全球实力的整体关联，使中国取得对美国的优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解放军同时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对其有利的努力。美国的挑战是与盟国合作，通过部署其强大的外交政策和经济资产来扭转这种局面。

持续战略合作的诸领域

还有一系列的政策挑战，对于这些挑战继续与中国进行双边或多边战略合作符合美国和盟国的利益。这并不是为了让美国人感觉好一点，或者是对中国人好一点。而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与北京合作而不是对抗最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即便是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在有限的几个领域合作，产生了对双方及整个世界都有利的结果。这种合作在各种军备控制协定中都有体现。此外，通过保留与北京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领域，美国将向中国政治体系的其他成员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华盛顿仍然准备在当前国际秩序的范围内与中国合作。美国这样做是在向中国更多的温和派发出信号，如果北京停止意在推翻美国在现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的行动，那么华盛顿将欢

迎中国像过去一样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换句话说，如果在习之后，中国决定在国内重回较为温和的路线，在国外则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内开展工作，那么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合作空间将迅速增加。在当前情况下，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领域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与中国谈判达成核军控协议，首次将中国纳入全球军控体系，防止新的核军备竞赛。
- 合作实现朝鲜无核化。
- 谈判关于网络战和网络间谍的双边协定。
- 谈判关于和平利用太空空间的双边协定。
- 谈判关于未来限制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武器系统的协议。
- 在 20 国集团中就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开展合作，防止今后发生全球危机和衰退。
- 通过 20 国集团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展多边合作，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开展双边合作，并与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开展三边合作。
- 作为全球研究联盟的一部分，合作开展关于突破性气候技术（包括长期太阳能储存）的全球研究项目。
- 合作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医疗和制药研究，以开发影响两国的主要疾病类别的新对策，包括癌症。
- 就制定有效的未来全球大流行病通报和管理机制，以及疫苗开发进行合作。

愿最好的一方在全球思想之战中获胜

观念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仍然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权力平衡

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很关键。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身、建设哪种类型，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观。这种观念上的较量还将继续。习近平已经向美国和西方提出了意识形态挑战，即专制资本主义模式和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对于北美人、欧洲人和其他相信开放经济、公正社会和竞争性政治制度的人来说，面临的挑战是要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理念的内在效力保持信心。

这一复杂思想体系的指导原则仍然非常简单：自由。在这一点上，自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 年宣布“四大自由”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当时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概念性框架，以对抗卑鄙地诉诸于民族、种族、身份和“效率”，而这些是那个时代法西斯势力意识形态攻势的核心。今天的挑战具有不同的色彩。中国接受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同时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人口、国情和潜在的政治敏感性。而作为自由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必须继续先管好自己的事。然而，认为这个阵营内部的问题需要在某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中，以同样的尊重对待一个对立的专制主义世界观，这种论点既愚蠢又危险。

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地指出，在它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它的世界观认为，利用党和国家的暴力来消灭政治反对派是正常的；党和国家决定你可以读什么文学作品或看什么电影也是同样正常的。即使我们认可中共的世界观对中国本身是正当的，但在别的地方却说不通，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公民继续在美国和更广泛的西方国家寻求庇护、机会和教育，而极少数人（如果有的话）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美国有效的中国战略不仅要

保证对中国的战略威慑、竞争、合作，以及必要时的对抗等基本要素到位，而且要保证美国积极投入到整个世界的未来价值观的伟大战役中。现实情况是，中国早就对自由民主发起了意识形态冷战。西方在这场斗争中沉默了太久。美国现在应该表现出充分的信心，相信在思想的领域，与社会正义相协调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能够并将取得胜利。美国的立场应该是：让思想之战再次开始。愿为争夺全球人心而进行认真的竞争，愿最好的论点能够获胜。

实施

任何新的美国对华战略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效执行。它必须持续、全面、多层次地执行：重建美国国家力量的基础；对中国实施战略红线；对中国其他任何侵犯美国重大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采取报复性行动；通过全面的战略竞争来集结美国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美国、盟国和全球利益需要的时候，与北京进行战略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全力捍卫自由民主，抵御当前专制资本主义的挑战，包括对中国国内制度的失败进行反复攻击；在美国的主要亚洲和欧洲盟国的充分参与下，协调和实施这一战略。这七个部分的战略必须在国家、双边、地区、多边和全球层面实施。这正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方针。同样，这也是盟友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因为无论是在特定的国家、地区还是机构中，盟友往往能做到美国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美国应始终牢记，中国除了朝鲜、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之外，没有其他盟友，这使得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美国处于相当大的战略劣势。盟友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种做法需要美国在国家与国际政策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协调。这将要求重建美国外交部门和美援署。要求将国务

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援署和情报界的行动充分融合。这还将意味着，未来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辅之以最优秀、最聪明的高级参谋）将需要单独负责全面协调并最终执行美国长期的中国战略。

结论

美国未来的任何国家对华战略要想取得成效，首先必须是可操作的，而不仅仅是宣示。正如本文反复指出的那样，美国说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作为第一步，美国必须建立国家机制，在国会高级领导层的全力支持下，在美国所有机构中制定、商定和执行这样一项战略。该战略必须具有权威性，采取总统指令的形式。它必须是长期的，在今后 30 年内实施。因此，它还必须是两党的，能够经受住多次选举和政府的考验。美国还必须与七国集团、北约和亚洲条约伙伴就这一共同的中国战略进行合作。同时要有定期的内在审查机制，以衡量在实现战略总体目标方面是否成功。

有人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像两代人前的凯南和杜鲁门政府应对苏联挑战那样，有效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应对中国的挑战。也有人质疑，是否还有足够的国家智慧来制定那种能够成功的详细作战战略。因为美国要在这样的两者间寻求必要的平衡：既要在必要时限制中国的行为，在适当时与中国合作，又要始终阻止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或政治侵略。还有一些人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团结和决心来跨越党派分裂的界限。这样的团结和决心不仅是维护共和国的理念，也是保持世界灯塔的角色所必需的。本文的目的是要论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现在的几代人将被证明不配成为最伟大的

一代美国人的继承者——这些伟大的一代打败了暴政，不仅维护了国家，而且维护了世界。

那么，美国这一新的中国战略是否成功应该如何衡量？答案是，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继续在地区和全球所有体现实力的主要指数的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阻止中国在军事上攻占台湾，也阻止中国采取任何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其地区目标；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到了巩固、加强和扩大，抵制了当前日益严重的非自由主义现象；习已被一个更温和的政党领导所取代；而中国人民自己也对共产党百年来提出的中国古老文明永远注定要走向一个专制的未来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原尾注 1-4:

1 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国际力量的解释，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共经常进行研究，试图衡量国家力量的关键方面，并将这些方面综合成一个综合分数，用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参见后文关于中国对美战略演变的讨论。

2 中国目前对威慑或缓和朝鲜针对美国、韩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的核政策兴趣有限。由于朝鲜盟友长期依赖中国的能源和粮食供应，要让中国对朝鲜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3 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必须作为紧急事项与台湾制定一项计划，为台湾提供足够的军事能力，以阻止中国的攻击。根据《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应确保这种能力的供应。在中国一有侵略迹象时，美国还应该计划向台湾部署自己的军队帮助保卫该岛。然而，美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改变其“一中”政策，除非和直到中国对台湾发起敌对行动。

4 这一要素的基础是常设仲裁法院 2016 年的裁定。美国还应该批准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